

短缺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一书摘要

编译者前言

《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教授亚诺什·科尔内 (Tanos Kornai) 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曾获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大学经济学博士、波兰大学名誉博士和巴黎大学名誉博士，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计量学协会主席，并且是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经济学会和经济计量学会的会员或名誉会员。

科尔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较高深的素养，谙熟经济系统论、控制论、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在批判地分析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套以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和非价格控制为特色的经济分析方法，并力图建立描述和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实证性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有：

《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1957)、《结构决定的数学规划》(Mathematical planning of structural decisions) (1967)、《反均衡论》(Antiequilibrium) (1971)、《突进与和谐的增长》(Rush and harmonic growth) (1972)、《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 (1980)、《非价格控制》(Non-price control) (1981) 和《增长、短缺和效率》(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1982) 等。

《短缺经济学》一书是科尔内的代表作之一。科尔内由于在本书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传统模式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深刻分析而在国际经济界享有盛名。他在书中提出的“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消费饥渴”、“父爱主义”等概念，已为经济学家所广泛运用。

他虽然讲的是东欧的事，但许多地方却使人感到“这正是说的阁

下的事情”。

《短缺经济学》一书是全面考察短缺经济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它以短缺为主线，以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分析为重点，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生动而细腻地刻画了短缺现象在这种体制下的各种表现，提出了对其进行统计描述的可能性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它揭示了短缺的原因不在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并进而说明了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该书是实证性的，力求客观地说明，避免价值判断，不以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为己任。但是，它对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运行原过程所做的出色描述，对匈牙利改革所做的种种分析，却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分析的依据，可以作为提出政策建议的理论分析基础。

现在笔者正在同张晓光、戴国庆、潘佐红、黄卫平和靳平同志一起翻译该书。考虑到该书的理论价值和它对我们当前改革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借鉴意义，笔者特将该书的基本内容先摘要编译出来。该书篇幅浩大，内容极为丰富，本摘要为篇幅所限，只能介绍主要的观点和方法，而舍去大量的前提、假定和论证，并且也不可能完全用作者原话。本摘要是根据英文原版摘译的，编译的不够准确或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由笔者个人负责。

第一章 引言

主题概述

本书书名中的“短缺”一词是一大类现象的概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了大量名称来说明这类现象，如，“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抑制型通货膨胀”，“紧计划”，经济的“过热”，等等。本书引入两个概念进一步加以说明，即增长中的“突进”（Rush）和市场上的“吸纳”（Suction）。

短缺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卖者和买者，配额的决定者和配额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短缺，或者是作为其它现象的原因，或者是作为它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它成分，即与价格、工资、计划、市场、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物质和精神刺

激，联系在一起。

本书是全面考察短缺经济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有些短缺现象可能出现在任何制度中，但这里只限于考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短缺。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理论，而限于说明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里略去了南斯拉夫，因为它的体制与其它东欧国家有实质性的差别；也略去了苏联，因为它的某些经济特征可以用幅员广阔来解释。至于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不太熟悉，不能肯定是否类似现象在那里也象东欧一样发生。

这里描述的是历史地产生和存在的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不是假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本书主要涉及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而不详细考察改革后的体制。偶而涉及，也总是与匈牙利1978年以前的经验有关。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在1929年大危机中，这个问题变得极其尖锐，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学家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问题的原因。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不是资源利用不足，而是“过热”；不是总需求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不是失业，而是劳动力短缺，如此等等。短缺在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方面，起着类似于失业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所起的那种中心作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迫使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提出说明这类现象的理论。

描述、方法、说明

我把描述短缺现象视为自己的第一任务，为此需要适当的工具。本书的第一主题是短缺，与此相关的、几乎同样重要的第二主题，就是经济系统论和经济控制论的方法论。

在分析短缺时，总有某些现象无法用通常的工具适当地加以描述。研究人员先是试图把现实纳入传统的形式中去，但总有些东西悬在外面。使工具适应现实迟早会比使现实适应工具更有益处。经济现实与分析工具之间的矛盾，正是本书不可避免地大量讨论方法论的原因。

描述现象并阐明用来描述和分析的方法论，当然只是第一步。更深层次的考察是详细阐明解释性理论。分别描述的短缺现象怎样相互联系？它们是偶然地同时出现，还是本来就不可分割？它们是偶然事件，还是在随机波动背后隐藏着规律性？在理论说明的范围内必须明

确指出：当前的经济政策会造成什么后果，哪些出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哪些是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存在的现象。

但是，揭示短缺的原因并非本书的唯一目的，说明短缺如何影响经济体制也很重要。应当说明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

我把本书视为我先前的著作，即《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反均衡论》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等书的直接继续。本书同《反均衡论》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它试图完成那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任务。

几个重要的限定

(1) 在一些领域我将涉及问题的政治方面。但我并不认为详细分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或党和其它政治机构在经济控制中的作用是本书主题的一部分。

(2) 本书较少涉及计划，而用大部分篇幅考察企业之间、企业和家庭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是因为关于前者的文献较多，而对后者尚未在文献中得到充分论述。

(3) 我不分析生产和交换组织，因此不讨论在不同市场中何种市场结构占支配地位，生产和交换的集中达到什么程度，以及所有这些如何影响短缺，等等。

(4) 本书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某些问题（如，第九、十一、十二、十六、十九和二十一章），但本书更多的具有微观经济学的性质。其主要任务是阐明宏观过程的微观基础。

(5) 我在少数地方（如，第九、十和十一章）分析了长期经济调节，但本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短期调节，就是说，把资源、制度、组织形式和经济系统的控制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决策者特有的反应，视为既定的。因此问题就成为：在既定的状态下经济如何运行。

(6) 我所讨论的企业几乎专指国营企业。这里不涉及合作制企业，也很少涉及所谓“第二经济”（包括官方许可经营的私人工商业，“灰市”和“黑市”）。

(7) 本书只提供描述性解释性理论，不提供规范性理论。它不包含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应当作什么变革的实际建议。我先前的著作提出过建议，将来还打算提出建议。但在本书中，即使建议已

经“呼之欲出”了，我也竭力加以克制。我对本书主题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困难。轻率地提出建议只能使问题部分地解决，甚至使情况更坏。如果彻底完成了对现状的“解剖”，即阐明了短缺现象更深刻的原因及其相互联系，就会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从而引申出实际的政策建议。

经验证实

本书通常只能指出这样一些变量、参数和指标，借助逻辑推论可以判定它们是可观察和可度量的。然而它们大都没有正式作为统计项目。即使作过一些统计，也没有对它们作全面的数理统计和经济计量分析。

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我们在经济研究和统计分析中常常是先作出经济推测，然后进行观察、数据搜集和数理统计分析，以便证实或纠正这种推测。

大多数情况下，我将不得不满足于提出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说，而不是已被经验证实了的理论。只要可能，我也将尽力指出检验这假说的方法。

第一篇 没有价格条件下的调节

这里将讨论微观经济组织的三种主要形式：

(1) 销售自己的产品以换取货币，并以其收入偿付其全部或大部收入的企业。

(2) 用国家预算资金开支，向使用者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3) 靠工作或享受某种其它权利取得货币收入来保证消费支出的家庭。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问题的作者们通常从消费品市场或家庭部门的经验出发。我的书则以考察企业部门为出发点。我深信问题的根源在这里，即在生产领域。本篇几乎专论企业部门（论就业的第十一章作为例外，涉及家庭部门），也简略地谈到非营利机构，而把家庭部门放到下一篇考察。

本篇一般不考虑价格、利润、工资和货币的作用。这样做的最重

要的一点理由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小。但在这种环境中，企业仍然存在着、发展着，并在自己的运行中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果对这些规律性作纯粹的分析，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说明本书结构的第二点理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价格信号和非市场控制机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数量”调节过程实际上在一切经济制度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发生在没有价格或固定价格的条件下。本篇希望通过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对更好地理解“数量”调节的性质作出贡献。

第二章 生产者：瞬时调节

我把企业的生产职能和销售职能分开来论述。第二、三章把企业作为生产者，随后几章先把它作为买者，再作为卖者加以说明。

生产者调节的分类

生产者调节可以划分为三类：

瞬时调节是企业对瞬时出现的情况不断作出适应性反应。在“瞬时”，固定资本存量和当前投入使用的产品、服务和劳动的存量都是既定的。

短期调节是生产者计划对今后几个月预期情况的适应。在“短期”，固定资本不变。短期调节包括彼此联系的三个成分：(a) 总量生产计划的决定；(b) 投入组合的决定；(c) 产出组合的决定。

长期调节是计划对今后几年预期情况的适应。在“长期”中，固定资本可变，这主要同投资分配有关。

短期和长期调节可以解释为学习。生产者从瞬时调节过程所引起的烦恼和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通过更为基本的变化使自己适应持续存在的困难。

生产增长的约束

有三种主要的约束：

- (1) 资源约束。一般形式是

全部生产活动中 第 i 种实际投入	≤	第 i 种投入瞬时 可得到的数量
----------------------	---	---------------------

我们不仅探讨微观层次，而且探讨亚微观层次上资源对生产的约束。

(2) 需求约束。一般形式是，

第 i 种产品的 销 售	≤	买者对既定价格下 第 i 种产品的需求
-----------------	---	------------------------

因为现在考察瞬时调节，价格看作既定的，需求也就成为既定的。这里需求只是以间接方式，即通过销售部和企业领导，间接影响生产车间。

(3) 预算约束。一般形式是，

企 业 支 出	≤	货币存量 + 企业收入
---------	---	-------------

在这里，“预算约束”一语是广义的，即作为财务支出计划的同义语。它用公式表示出“独立核算”的原则。预算约束总是通过限制企业购买物质资源的方式，来间接地影响生产。

约束的有效性与硬度

现在只要在约束条件上再加上一个目标函数，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标准的线性规划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用这个模型来求解企业的最优规划，而是用它来描述企业事后的实际运行。

有效约束是实际发生作用的约束，在规划问题的解式中它们是等式。比较窄的约束制约生产，因而是有效的。

资源约束具有物质性，表明了不能无中生有这个真理。它不可逾越。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表示的不是物质必然性，而是行为规律性，它们是人决定的，人也能够违反它们。这类约束称为可接受的约束，其软硬程度取决于要求人们遵守行为规则的社会关系，可能很硬，也可能很软。

资源约束型体制与需求约束型体制

下表概括了古典资本主义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企业的最重要特征。

约束类型	古典资本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
资源约束	很少有效	几乎总有效，比需求约束更严格
需求约束	几乎总有效，比资源约束更严格	很少有效
预算约束	硬	软
生产计划	自主的：在资源约束内，由企业 在需求约束水平上制定	指令的：在需求约束内，由上级 在资源约束水平上制定

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主要受需求约束，传统社会主义企业运行主要受资源约束，这个命题在全书的思路中起中心作用。

从思想史上看，就资本主义企业而言，需求约束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市场有限吸收能力之间矛盾的分析是人所共知的。

凯恩斯也致力于这个问题。他研究的是商品的有效需求如何才能增长，以便使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在苏联二十年代的经济讨论中非常强调对比。克里茨曼在192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滞存，在无产阶级的自然经济中则是普遍的短缺。”

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区别就是，前者的生产能力利用参数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

这种对比也被用于发展中国家。如赫希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增长。一种类型中向前的联系占支配地位，生产者推着前面的使用者（这类似于需求约束）；在另一种类型中向后的联系占支配地位，使用者拉着后面的生产者（这类似于资源约束）。

短缺和滞存

在对生产进行瞬时调节的场合，短缺是指得不到实现某种严肃意图所需要的投入品。这里车间的日作业计划，包括计划规定的工艺和产量，就是生产者的“严肃意图”。我们是与完成这种意图所需要的投入相联系来度量短缺。

在同一条件下，滞存 (stack) 是指各种即刻不能利用的资源。“剩余” (surplus) 一词有贬义，“储备” (reserve) 一词有褒义。滞存一词不包含价值判断，是中性的，并且它既包含剩余，也包含储备。从经济单位的角度，可把滞存分为内部滞存和外部滞存。对企业来说，“在职失业”属于前者，社会上的失业则属于后者。

我们用 Z 表示短缺指标；用 q 表示滞存指标。短缺和滞存都是集合名词，它们不是标量而是向量，只能用指标的集合 (Z 或 q) 来描述。短缺和滞存必须分别计量，把短缺和滞存彼此冲销就会使结果失去意义。短缺和滞存时时刻刻以数以百万计的亚微观层次上的基本事件的形式出现，我们只能对这些事件作统计描述，并用概率分布来表示它们。

短缺与瞬时生产调节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短缺而对生产做瞬时调节。这种调节有三种基本形式：(1) 使产量与当前瓶颈，即此刻最稀缺的资源相适应；(2) 由短缺引起的投入组合的更改，即实行强制替代；(3) 根据可得到的投入品来决定产出构成。其中强制替代是生产瞬时调节的最经常最重要的形式。它与跨时再配置有某种联系。比如，此时因资源约束未完成的工作，彼时可通过加班加点来完成。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买者此时不需要的东西生产出来了，而急需的东西却没有。强制替代会掩盖短缺，但并不能消除短缺。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短缺指标之一。

上述三种形式的强制调节可能在车间里同时出现，也可能从一个车间传导到另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传导到另一个工厂。短缺滋生短缺。这种短缺引起的强制调节的影响可能在生产中倍增和溢散。这种倍增和溢散可能会由于使用者或生产者有存货而被吸收，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化了。

短缺会造成心理压力，占用管理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应付各种

意外事件，而无暇对工艺和产品质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

关于短缺和滞存指标的几点假说

(1) 经济体制的主要短缺和滞存指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当体制的结构和外部条件大体稳定时，这些指标的期间平均数也是相当稳定的。我们把这些期间平均数称为指标的正常值并标以星号“*”。

我们说“正常短缺”和“正常滞存”，并不是单纯地指它们是随机变量，有平均值，而是说，在经济体制中，反馈和控制在起作用，从而使偏离正常状态的短缺和滞存回到正常状态。

(2) 现实中不存在正常短缺和滞存均为零的理想体制。

(3) 正常短缺向量 Z^* 和正常滞存向量 q^* 取什么值，表明各种体制的特征。

(4) 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比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短缺指标的正常值高得多，它经常碰到资源约束。

(5) 即刻可动用滞存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比在资本主义下小得多。

(6) 正常标准本身是历史地产生并由社会习惯固定下来的。社会制度和控制机制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社会预期和习惯的变化，都会导致正常标准的修正。例如，匈牙利改革和政策调整以后，短缺和滞存指标取值减小了。

“正常状态”这一表述并不暗含任何价值判断，既无贬义，也无褒义，是中性的。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只是要说明经济体制按其内在规律运行。对各种体制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弄清它们的主要状态变量的取值是什么。比较经济体制要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体制的正常状态与另一种体制的正常状态有什么不同。

第三章 生产者：短期调节

短期调节主要考虑近期（季度和年度）计划的决定。计划者尽量考虑预期的情况，即企业的生产潜力和对其产品的要求，并根据这些情况调整产品的指标。

瞬时和短期调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短期调节越成功，瞬时

强制调节的必要性就越小；相反，频繁的瞬时调节及其不利后果，也能成为影响下一期短期计划制订的信号。

紧生产计划

对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来说，上级制定的计划通常是：“紧的”（taut）。关于计划的松紧可以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企业接受了生产计划和完成计划所需的全部资源，在没有碰到资源约束，也没有任何强制替代或计划产出组合的临时修正的情况下完成了计划。上级会认为这种计划是“松的”（loose）。

第二种：企业最终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但在完成计划过程中碰到了资源约束。企业用不同方式（反复进行强制替代、跨时调整等等）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上级会认为这是一个紧的、但可实现的计划。

第三种：企业作了各种瞬时强制调节，仍不能完成计划。上级会责怪企业，但企业会认为计划过紧。

计划的“紧”是一个随机范畴。计划越紧，实施过程中碰到资源约束、实行强制替代和被迫偏离计划的产出构成的可能性就越大。

紧计划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计划无限拉紧。在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在同一制度的不同时期，都会历史地形成自己的正常紧度和容忍上下限。即使在集中程度最高的时期，计划指令也不是单方面的命令。在计划确定前，计划制订者和执行者之间会“对计划讨价还价”。

容忍上限是企业所能接受的计划紧度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企业会认为计划无法完成。容忍下限是制订计划的上级所能接受的计划紧度的极限，低于这个限度，上级会认为计划太容易完成，缺少推动力。正常紧度是计划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习以为常的计划紧度，调节计划紧度的机制就建立在它们之上。

有两种反馈机制在发生作用：

第一种叫正常标准控制。如果预期碰到资源约束比正常标准更频繁，那么计划就会降低；反之，则提高。

第二种叫容忍限控制或临界值控制。如果碰到资源约束的频率超过容忍上限，计划会下调，低于容忍下限，则上调。

同每种反馈系统相联系，有一个信号系统。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

中，一个有多种信息在其中流动的、复杂的信号系统在运行。这些信息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是非价格信号，即“数量”信号。相对稀缺、短缺和滞存变动的信息并不通过价格的变动来传递。完成预订生产计划的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信号。企业屡次达不到计划指标，可能表示计划过紧，下期计划就可能放松；超额完成则表明计划太松，下期计划就可能拉紧。企业很清楚这种反馈，称之为“计划基数”（planification）不断提高。这就使企业警惕：尽管超额完成计划通常能得到奖金，但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并不明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由上级部门为企业制订计划这种传统情形。但是，在1968年改革后的匈牙利，已经不再通过中央计划指令规定企业下一季度或下一年生产什么；每个企业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短期生产计划。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产生了许多有利后果。但是，企业自己规定的计划仍然是一个紧计划。我们在这里指出促使企业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限度的三个因素，仍还不是全部因素。

（1）短缺本身会鼓励企业这样做。需求者的“意见”会造成增加产量的压力。

（2）上级虽然不再能命令企业更多地生产，但仍能非正式地施加压力。企业也会按上级的要求做，因为把资源“囤积”看做社会损失和浪费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3）企业也自愿追求产量增加。因为改革后的匈牙利企业仍处于或迟或早能把生产成本的增加转嫁给买者或国家预算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起初边际成本的增加不能立即由边际收益的增加来补偿，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也是符合企业的利益（包括利润动机）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文献和日常用语中，同紧计划相联系的这类现象被称为数量态度或数量冲动。

投入和产出组合的短期调节

我们关于短期调节的假说如下：

尽管伴随滞后，并且只是作为一再碰到资源约束的反应，但针对这种或那种资源长期短缺所做的持久工艺调整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即使投入品相对价格未变，采用新组合也没有事先进行货币成本最小化的系统研究，这种调整仍会发生。

我确信这个假说是正确的。我感到不那么肯定的是“或迟或早”这个表述如何具体化。我也不能肯定，以相对价格和成本最小化为基础的控制机制同以对相对短缺直接感知为基础的控制机制相比，哪一个更迅速可靠。人们可以因价格机制只能在事后发生作用而指责它，即指出相对稀缺发生变化以后很久，相对价格才会做出反应，而投入组合调整到适应新的价格，又要花费一段时间。这种批评是对的。但人们同样可以说，车间主任或主管部门的官员同样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资源A比资源B的相对稀缺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现象，随后可能又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人们才会用持久的工艺改变取代各种临时的强制替代。

相对价格机制的一个优点是：它更客观，更不依赖于个人，它的运行不那么需要人为的压力。它大概更简单可靠。最终决定使用何种工艺的人不用靠记忆和印象勉强比较碰到资源约束的相对频率，只要进行相对简单的成本核算就行了。

上述比较中我们假定工艺改变随事后的信号而来，即相对价格已经变了或短缺已经出现，然后才有新工艺的采用。在现实中当然同样有事前的信号。在没有价格信号的机制中，同未来资源利用有关的计划指标可以在当前决策中加以考虑。从这种观点看，制订计划有巨大的潜在优势。至于社会主义企业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可能性，那是另一个问题。

比较中还涉及动力问题。利润刺激在基于相对价格的工艺调整中会发挥一定作用。但即使车间主任和部里的官员同利润没有直接物质利益关系，他们对资源短缺也不会漠不关心。物资和劳动供给缺乏保证，进行强制替代的困难，先前采取各种临时措施造成的紧张和烦恼会使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对投入组合进行短期调节。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中，影响产出组合的反馈机制大大弱于影响投入组合的反馈机制。因为在短缺条件下，企业把调整投入组合看成自己的事，而把产出组合使用者的要求不一致看作使用者的事，当然，卖方企业不能对买方企业的抱怨置若罔闻，并且迟早会对这些抱怨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可能要比调整投入组合慢得多并且不大可靠。因此，对投入和产出组合进行短期调节这两种过程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等同的。在投入组合方面，企业灵活性较大，比较愿意作

出调整；而在产出组合方面，企业则比较僵化和保守，它更多地对依赖它的买者发号施令。

生产者和使用者、卖者和买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称是本书一再出现的论题。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种不对称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投入组合比产出组合对非价格短缺信号的反应更敏感。

关于企业经理的动机

人类行为的背后有各种动机，我不愿意为获得一个一般性的外观，把它们追溯到单一的动机。如果我们看到哪些动机是同时出现的，在它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这将有助于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在企业经理行为方面最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他们与自己的工作结为一体。这并不是说经理会为企业利益尽最大努力，只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力求把工作做好。

微观经济学经常提到劳动的负效用，与此相对的是在闲暇时间进行消费时所享受的效用。我认为这种说法对多数劳动并不适用，特别不适合于描述在经理职位上劳动的那些人的情形。在复杂的形势下指挥和决策是令人兴奋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碰到许多困难，但也从工作中得到愉快和满足。

经理与自己的工作结为一体具体表现为三个“自然本能”：

- (1) 保证自己所负责的单位生存下去；
- (2) 避免混乱和无秩序，保证自己和下属工作顺利；
- (3) 使本单位得到发展。

社会条件，物质和精神刺激，抱负和恐惧，报酬和惩罚的作用，于是都集中于这些“自然本能”。

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自上而下逐级任命经理，这样就建立起一条纵向从属链。在这种环境中，企业经理有不言自明的动机，要赢得上级的承认，避免得罪他们，并且要实现他们的期望。很多人认为，数量冲动背后的动机，调节方面的刚性，以及伴随而来的短缺，都必然来源于官僚体制中的这种依附关系。按这种看法，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中央经济政策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使一切服从于增长，并通过计划指令驱使企业这样做。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本书考察的那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我本人强调“与工作结为一体”的动机，因

为这个一般动机本身就足以引致企业对投入品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

其实，关键问题不在于哪种动机产生数量冲动，企业不可满足的需求和以后要谈到的扩张冲动，而在于是不是存在从相反方向发挥作用的力量，使得企业的经理自愿地抑制投入需求和扩张冲动。本书的进一步展开，就是试图一步步对这个真正重要问题作出回答。

第四章 买者：采购过程

上两章考察了作为生产者的企业，本章和下一章把企业作为买者加以考察。

微观经济学把采购看成一次完成的行动，我们则把它看作一个要花费时间的动态过程。我们用采购程序来描述这个过程。

采购过程中的若干决策问题

我们伴随一位买者去采购。当他来到第一个销售点，如果这里没有他初始需求的产品，但有一种相近的替代品，他就面临是否实行强制替代的选择。

强制替代不同于自愿替代。如果两种产品都在出售，买者却由购买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这是自愿替代；但如果由于缺少作其它选择的物质条件，买者不得不购买替代品，那就是强制替代了。

当买者未得到所需产品，又不愿意实行强制替代时，他可以继续搜寻。

搜寻包含各种牺牲，需要花费时间、支出费用、耗费精力并带来紧张和烦恼。搜寻成本不断提高，会迫使买者修正初始需求，接受强制替代或采取等待的方式。

等待象搜寻一样要花费时间。就买者而言，区别在于搜寻是积极的反应，等待是消极的反应。

买者等待一段时间，就会再去询问卖者是否到货。到不同销售点去搜寻和反复询问同一卖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取得有关商品的信息。在短缺条件下，这种信息搜集活动大部分要由买者来承担。

等待的一个特例是排队。它可以是实际上的，也可以是观念上的，即确定“先来先招待”的原则。排队人数多少，排队时间长短会强烈影响买者是否加入排队。

争取卖者的努力。

在长期短缺的吸纳经济中，卖者知道许多买者都可望得到某种产品，因而能对他们加以选择。买者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尽力争取卖者，以先于其他买者得到产品。有许多办法可以达到此目的。

(1) 许多卖者让老主顾优先，因而买者尽量表现得忠诚可靠。

(2) 卖者可能偏爱不找麻烦的买者，所以买者在向卖者的上级告状或根据合同要求赔偿前，不能不考虑再三。光有不抱怨还不够，最好有主动姿态。做卖者的“好朋友”，会给业务交往带来好处。

(3) 也存在用行动争取卖者的可能性，纯粹的腐化也出现了。对此可以诉诸法律。但另一些间接的酬谢形式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诉诸法律。买卖双方常常互换其位，今天你帮我买这个，明天我帮你买那个。这种服务的交换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中间隔着两三层。我同事的同事，帮助你同事的同事。每一个在这里受惠的人，都能在那里报答。如果这种互惠链条全面建立起来，那么必然给选择过程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交换活动不仅是物的所有权交换，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这种关系完全取决于买卖双方的相对力量：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交换双方谁处于支配地位，谁处于服从地位。

买者态度。

严格地说，应当用随机变量来描述买者态度的成分，并用联合分布来表示它们的特征。但我们只想说明一般概念，只需用确定性描述就够了。其中的取值可以视为随机变量的期望值。

我们可以用实数或向量来表示态度变量的各个分量。态度变量是这种或那种解释性变量的函数。就其数学形式而言，可以视之为参数和函数的集合。

买者态度的各主要成分，可以按其经济内容排列如下：

(1) 初始需求函数。其解释性变量下章讨论。

(2) 强制替代倾向，可以用初始需求中愿意接受强制替代的部分所占的比重来表示。

(3) 搜寻倾向。可用买者平均愿意跑的销售点数表示。

(4) 排队倾向。可以是预期等待时间的函数。

(5) 争取卖者的努力。可以是搜寻持续时间和排队长度等等的

函数。

以上诸点并不是买者态度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如果把买者对价格的反应纳入分析范围的话。如：第十四章将分析企业对投入品价格的反应，第十五章论述买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抵制涨价的问题。描述企业行为的这两个重要指标显然属于买者态度。

第五章 买者：需求形成

本章的主题说明在不断重复的采购过程中，决定初始需求的买者行为的持久特征是什么。

企业的物资需求函数。

就物资采购而言，初始需求的决定是不断重复的习惯性工作。人们按经验方法提出采购单。这包括一个三步骤决策程序：

第一步，列出适用物资的清单；

第二步，确定适用物资的预期消耗量；

第三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初始需求。公式给出初始需求向量的第*i*个分量。

$$\begin{array}{l} \boxed{\text{在第 } t \text{ 日}} \\ \boxed{\text{对第 } i \text{ 种}} \\ \boxed{\text{物资的初}} \\ \boxed{\text{始需求}} \end{array} = \left\{ \begin{array}{l} \boxed{\text{理想的}} \\ \boxed{\text{货存}} \\ \boxed{\text{系数}} \end{array} \times \boxed{\text{在某一期间第}} \\ \boxed{\text{ } i \text{ 种物资预期}} \\ \boxed{\text{的耗费量}} \end{array} - \boxed{\text{在第 } t \text{ 日第 } i} \\ \boxed{\text{种物资的预期}} \\ \boxed{\text{投入存货}} \right.$$

$$0, \quad \begin{array}{l} \boxed{\text{理想的存货}} \\ \boxed{\text{实际存货}} \end{array}$$

如果实际存货低于理想的存货
如果实际存货不低于理想的存货。

我们可以把经验方法及其实施程序称为企业的物资需求函数。我们广义地理解“函数”这个范畴。经验方法及有关程序能保证某些解释性变量和因变量(初始需求)之间获得确定的联系，因而可以称为函数。

下面我们通过同新古典需求函数比较，来说明社会主义企业的物资需求函数的一般特征。

(1) 按照一般均衡理论，企业的产量和实际的投入产出组合是

一次同时形成的。在考虑到投入品和产出品相对价格并遵守预算约束的基础上，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的投入产出组合被确定，企业的物资需求也就确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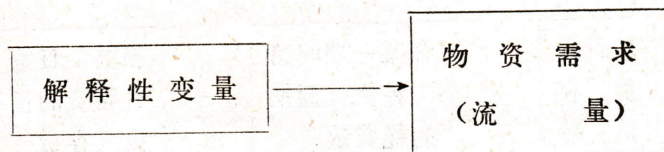
与此相反，我们把生产意图和购买意图的形成和相互调节，解释为一个动态过程；又把这种连续错综复杂的相互调节划分为两种时间状态：短期调节和瞬时调节。

(2) 新古典模型假定供给不会对需求形成约束。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下，任何东西都不会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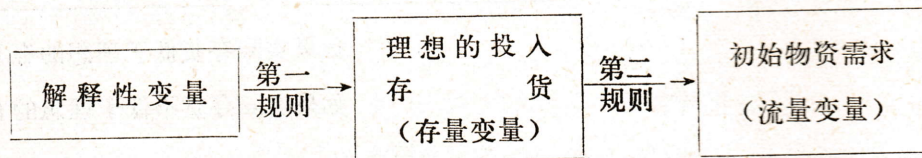
我们不采取这个假定，相反，必须说明长期短缺怎样影响实际购买和购买意图。

初始购买的形成是建立在预期的基础上的。企业作为买者意识到预期的不确定性，因而形成某种保险战略。不确定因素越多（如，供货期间长短和变化大小，短缺频率高低，产量和投入品用量超计划要求的可能性大小，替代品获得的难易，等等），企业对投入存货的需求量越大。

(3) 新古典需求函数描述了解释性变量与作为流量变量的物资需求函数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我们则描述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插进存量变量，由此给出投入存货的理想水平：



我们认为企业物资需求函数由两个规则组成。第一规则描述买者态度的一个成分，即企业力图建立什么样的投入存货。这是企业行为的一个相对持久的特征。第二规则描述在企业理想的投入存货水平已定时，它的瞬时购买意图是什么。

(4) 最后一个重要区别是，我们不一般地说“需求”，而是说

“初始需求”，它只是买者态度的一个成分。如果它得不到满足，买者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强制替代、搜寻，等等。在非短缺经济下其它成分并不重要，只用需求函数描述买者的问题也未尝不可。但在短缺经济中，这样做就远远不够了。

仅仅限于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作比较是不够的。在过去十五年中，一个探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新趋势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克洛沃—巴罗—格罗斯曼学派 (Clower - Barro - Grossman School)。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在许多方面都同这个学派有关。我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同他们相近，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明显的不同。

克洛沃强调当供求不平衡时，购买意图同其实现之间可能发生分离。他主张，如果供给持续低于需求，那么只有“短缺一方”能够占主导地位，实际购买在供给水平上实现。用公式表示就是：

$$y_i(t) = \min(d_i, s_i)。$$

其中 $y_i(t)$ 表示实际购买； d_i 表示需求； s_i 表示供给。

克洛沃的“短边原理”同总是致力于探讨均衡存在的条件和均衡状态的性质的传统方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他实际上只抓住了静止的一瞬，即购买达到供给约束的那一点，而问题始终在于持续和瞬时调节的动态过程。这是不能用静态模型来比较的。

我们这里只想就一个特殊点进行比较，即就购买意图及其可行性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形，来考察强制替代的作用。我们的公式是：

$$y_i(t) = \min [s_i, d_i + u_{ji}(d_j - s_j) +]$$

其中 y_i 、 s_i 和 d_i 同上。 d_i 和 s_j 是另一种商品的需求与供给， u_{ji} 是强制替代倾向， $u_{ji}(d_j - s_j)$ 表示对产品 i 的强制替代需求。

对比两个公式可以看出，前者与后者都使用了非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但前者只考虑了初始需求，而后者不但考虑了初始需求，还考虑了由短缺引起的对初始需求的修正。伴随强制替代的出现，短缺也开始泛滥，从产品 j 的市场，扩散到产品 i 的市场。尽管每个人都买到了东西（进行强制替代），但其中大部分人仍有一种“匮乏感”。

需求的观察与度量

我们用 $u_{ih}(t)$ 表示第 t 日销售点 h 的第 i 种产品的期末存货。以下是两种极端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足以下条件：

$U_{ih}(t) > 0$ ，对每个 h 和 t 。

如果每时每地产品 i 都有正存货，就证明没有更多的初始需求，也不可能售出更多的产品 i 。就观察和度量而言，这意味着仅仅对实际购买 $y_i(t)$ 进行观察，就足以推算出买者意图 $d_i(t)$ 。我们称上述公式为需求客观可观测性条件。

第二种情形满足以下条件：

$U_{ih}(t) = 0$ ，对每个 h 和 t 。

这种情形下初始需求 $d_i(t)$ 可能等于、小于或大于实际购买 $y_i(t)$ ，由此可以引出以下不可能性命题：

当期末存货在每个销售点总为零的时候，从实际购买量 $y_i(t)$ 得不出关于初始需求 $d_i(t)$ ，即最初购买意图的推断。

现实经常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如果很少有存货为零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和地点有正期末存货，需求客观可观测性条件至少被近似地满足，从而作为近似，可以从 y 推断 d 。

但如果短缺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大范围经常出现，那么，不可能性命题就会生效，于是从 y 推断 d 就变为不可接受的，这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性，没有什么经济计量学技术能挽救它。在长期严重短缺条件下，试图检验既定的购买反映了初始需求的满足、修正过的需求满足，还是供给约束，是徒劳的。

这一切并不是要表明在短缺经济中没有办法观测需求。可以有許多办法，如，询问买者，搜集他们的意见，观测排队长度和未交付订货或拒收订货的数量，等等。但必须注意，这些观察和度量既不客观，也不十分可靠。

囤积倾向

作为买者，社会主义企业行为中存在着囤积倾向，即企业力求积存尽可能多的投入品。这种倾向出现在传统的和改革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强烈的数量冲动驱使企业囤积。出于第三章描述的那些动机，企业力求增产，从而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品；而生产和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不过也有相反因素制约着囤积倾向：（1）企业储存能力有限；（2）上级用各种方式对企业施加压力，使它不囤积过多，如，实行物资配给，限制为物资储存提供的贷款，在会议或报刊上批评囤积过

多的企业，等等；（3）企业也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自愿限制物资需求。

以上三个因素主要在限制企业存货总量方面发挥作用。因此，企业的囤积倾向表现在有选择的形式中。它力求囤积尽可能多的重要的、难于替代的或供给无保证的物资，对其它物资则满足于较少的存货。

在企业行为方面出现了两类似乎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亚微观层次上，瞬时初始需求总是确定的和有限的；另一方面，把所有企业和所有投入总和起来，就一个长时期来说，需求是不可满足的，因而趋向无限。

囤积倾向和对当前生产投入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一起，表示企业从经济中吸取外部滞存的基本过程之一。它们用这种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短缺状态的持续再生。

数量冲动、囤积倾向和物资短缺联系在一起，形成互相加强，自我维持的恶性循环。

中央物资配给

上一章和本章到此为止讨论的主题一直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央物资配给的影响。中央物资局和各生产部门在制定物资平衡表，实行物资配给，规定交换范围和搜集买卖双方活动的信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央物资配给限制企业自由决策，但并不取消它。这表现在企业能事前对中央物资配给决策施加影响；同时中央物资配给通常采用相对总量的形式，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这样，企业在执行中央决策和在非集中控制的交换方面，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中央物资配给虽然对企业间投入产出流量发挥极大的影响，但并不取消短缺条件下买卖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及其内在规律性。企业作为配额申请者体验到的纵向短缺，是企业作为买者感觉到的横向短缺的补充，甚至先导。

匈牙利改革以来，中央物资配给几乎完全取消了。这消除了物资配给的复杂和僵化所引起的许多困难，但并没有消除经济的资源约束性质和短缺持续再生所引起的问题。

第六章 卖 者

关于买卖双方作用的不对称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使我们习惯于把买卖双方所起的作用看成完全对称的。但是只有当买卖双方都具有硬预算约束时，这种对称性才是完全的。如果货币不真正发挥重要作用或不是积极地影响决策，只是消极地记录过程，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种具有软预算约束，即使长期亏损也能生存下去的经济单位，对价格必然不敏感。相对价格的影响微弱已经包含了买卖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可能性，因为价格不能发挥“补偿”作用，卖者感到他付出的实物比买者付出的货币更重要。这样，在短缺条件下，买卖就变成了卖者施惠于买者。

我们用下表来说明在纯粹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体制中，买卖双方作用的不对称。当然纯理论同现实总有差别的。

资源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体制中的购买和销售过程

	资源约束型体制 (吸纳)	需求约束型体制 (挤压)
购买	初始需求可能不得不修正多次 初始或修正过的需求可能碰到供给约束 购买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购买意图可立即实现 购买意图碰不到供给约束 “购买过程”简化为一次性购买活动
销售	销售意图可立即实现 销售意图不会碰到需求约束 “销售过程”可以简化为一次性销售活动	初始销售意图可能不得不修正多次 初始或修正过的销售意图可能碰到需求约束 销售需要较长时间

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把表的右上方和左下方联系起来：买卖双方都通过一次性买卖来完成交换。但在现实中总有一方（买方或卖方）

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买者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采购过程，经常碰到供给约束；而卖者遇到销售困难则只是偶然发生，并且只是短期的现象。

短缺对投入和产出存货以及订货的影响

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根据存货的变动进行生产，叫做为存货生产；另一种是根据订货单进行生产，叫做按订货生产。

为存货生产和按定货生产的比例，以及根据什么决定产出存货量和未交付订货量的问题，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一方面取决于短缺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需求差异、产品性质、技术条件和购销协调等组织因素。体制因素和组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产生出正常的存货量和正常未交付订货量的标准。这些标准随组织状况和市场力量的变化而变化，但在一定时刻则是一定的。这里，我们提出可为经验证明的四个假定。

(1)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正常投入存货在全部正常存货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正常产出存货的比重则比较小。

(2)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生产性产出存货的正常水平在组织因素认可的最低水平附近形成；非生产性（呆滞）存货的正常水平则大大超过组织水平认可的最低水平。

(3)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正常未交付订货量大大超过组织因素认可的最低水平。

(4) 改革后的体制同传统体制相比，正常投入存货在总存货中的比重减小了。此外，非生产性存货在总存货中的比重也减小了。这表明虽然改革后短缺仍存在，但其强度降低了。

从以上假定可以得到两点方法论的启示。

第一点是：存货总量的增加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畅销品存货增加，表明短缺强度降低；投入存货增加则表明短缺强度提高。

第二点是：不可能从存货量和未交付订货的总量统计数字中分辨出我们论述的是资源约束型，还是需求约束型经济。用是否缺少存货，或者说，是否有负存货来判定一个经济是不是短缺经济是错误的。我们只有通过投入和产出存货的比率，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滞存的比率，以及各种订货的积压量的比率等非总量指标，才能确定经济体制属于哪种类型。

相对市场力量对生产的影响

相对市场力量不仅在交换领域对买卖双方的关系有强烈的影响，而且对生产有强烈影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最重要的。在“买方市场”中，生产者—卖者不仅要用优良的服务态度来赢得买者，更主要的还要靠提供优质产品，不断推出新产品来战胜竞争对手，赢得买者。如果企业毫无销售困难，动力也就消失了。在长期短缺条件下，买方企业准备接受质量很差的商品，作为卖者的生产者没有内在的经济刺激靠引进质量更好的新产品来开拓市场。卖者相对力量的加强，在促进产量增加的同时，却削弱了对产品质量的改进。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长期短缺最严重的不利后果之一，即推动产品质量不断改进的动力不再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七章 生产和交换的正常状态

本章分析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说明短缺经济中生产和交换的正常状态。本章和第八章与其它各章的分析形式有所不同，抽象层次更高一些，并更多地使用数学模型。本章提出了关于局部市场的动态模型和关于生产和交换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动态模型。本章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关于非瓦尔拉斯均衡

“均衡”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在自然科学中，对均衡的解释一般是广义的。它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由于自身的规律性，它总是能够恢复原状。如果系统内部的作用力相互抵销或补偿，系统就处于均衡中。

广义均衡也用于社会科学中，指的是由一般经济规律和带有制度特征的那些规律性所产生的状态。当系统偏离这种状态时，系统内部的控制机制会使它向原状回复。广义均衡是一个描述性范畴，不含价值判断，说一个经济系统是均衡的，只是说它处于自己的稳态或正常状态，并不包含对其“好”或“坏”的评价。

狭义均衡是指瓦尔拉斯均衡，它表示在所有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上同时达到供求平衡，既无短缺，又无剩余的状态。它是广义均衡的

一个特例。这种均衡含有价值判断，是一种理想状态。

因为在经济学中往往把均衡理解为瓦尔拉斯均衡，所以我们用“正常状态”（normal state）一词来表示广义均衡；对狭义均衡总加上定语“瓦尔拉斯”。

我在《反均衡论》一书中对“均衡”的解释并不准确，给人以否定均衡存在的印象。但否定了广义均衡，就等于否定了体制内部存在不断再生产出它的基本特征的规律性。均衡不仅包括瓦尔拉斯均衡，还包括非瓦尔拉斯均衡。前者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理想的标准和参照系。而现实体制总是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资本主义下是存在失业的均衡，社会主义下是存在短缺的均衡。这两种状态在这两类体制中是持久存在的，是它们各自的正常状态。

在苏联二十年代的经济论战中，有人把短缺说成“生产不足危机”。我认为短缺并不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经济危机的表现，而是这种经济的正常状态，短缺不仅与这种经济的运行和增长和谐共存，而且构成它的基本特征之一。

关于短缺指标的总计问题

短缺经济的状态不能用“总量过度需求”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个范畴并不适用于长期短缺，货币不积极起作用的经济。

和初始需求一致的购买，不应当同用于强制替代的购买相加。储蓄没有很快增加说明人们支出了自己的货币，但并不能证明消费者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因为这些货币很可能花在强制替代上，而不是初始需求上。短缺和滞存也不能相互抵销。一个市场的短缺不能用另一个市场的滞存来冲销；从动态看，一个时期的短缺，也不能用另一个时期的滞存冲销。这是因为短缺与滞存是相伴而生的，用滞存去冲销短缺，就会掩盖真实的短缺强度。短缺和滞存要分别统计。

我们用向量 $Z = f(z_1, z_2, \dots)$ 来表示短缺。 z_1, z_2, \dots 表示各个短缺指标。我们先进行某种指标的总计或计算某组产品的平均数，然后对一个较长时期 (t_1, t_2) 和 (t_3, t_4) 加以比较。如果下述条件被满足：

$$Z_{ij}^*(t_1, t_2) > Z_{ij}^*(t_3, t_4), \text{ 对每个产品 } i \text{ 和每个指标 } j,$$

$$Z_{ij}^*(t_1, t_2) > Z_{ij}^*(t_3, t_4), \text{ 至少一个 } i \text{ 和 } j,$$

即：用任何一个指标衡量，对每一个产品，短缺强度的期间平均数不增加，同时至少用一个指标衡量，它对至少一个产品减少了，我们就可以说短缺强度降低了。如果对某些产品用某些指标衡量，短缺强度稍有提高，而用其它标准衡量短缺强度大大降低了，我们仍可以说短缺强度降低了。匈牙利经济七十年代初同五十年代初相比，生产资料市场的短缺强度降低了，而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强度提高了。

植物性控制 (Vegetative control)。

比较经济体制理论通常把有价格信号的分散控制同没有价格信号，只有“数量”信号的集中控制相对照。我们认为存在着没有价格信号的分散控制。我们能够在一系列简化的假定下证明，一个完全分散的抽象经济体制可以不依赖于价格信号而运行。这不仅是抽象的理论模型，它也存在于现实中并且可观察。分散的“数量”控制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于其它体制中。我们把这种类型的控制同高等生物机体中植物神经的作用相类比，称为植物性控制。这种控制，调节最简单、最基本和最琐细的实际经济过程。

在强调植物性控制即使在传统体制下也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传统体制下纵向的多级控制占主导地位。向下传输的主要是计划指令，同上传输的则主要是建议、申请和关于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

匈牙利改革后的体制中，纵向信息流大大减弱了，而价格信号的影响在企业部门依然相当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植物性控制的作用加强了。

第八章 调节中的摩擦

本章论述经济调节过程中的一般摩擦因素及其同短缺和滞存的关系。

经济调节中的一般摩擦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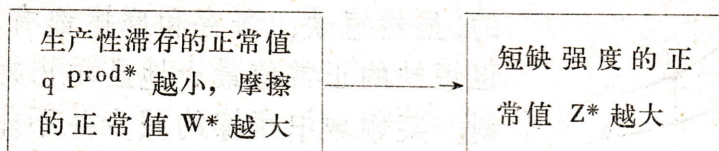
任何体制下的经济调节过程中都存在摩擦因素，它们包括：（1）买者不具有完全的商品信息；（2）卖者对需求预测误差；（3）买者摇摆，即在采购过程中买者的购买意图发生变动；（4）卖者的刚性，即卖者对调整供给结构的抵制；（5）调节的延滞，即把供给调

节到与新的需求相适应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

上述五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供求结构的协调，这种影响被称为经济调节中的摩擦。我们用 W 表示包含上述五个因素的摩擦向量。

短缺、滞存和摩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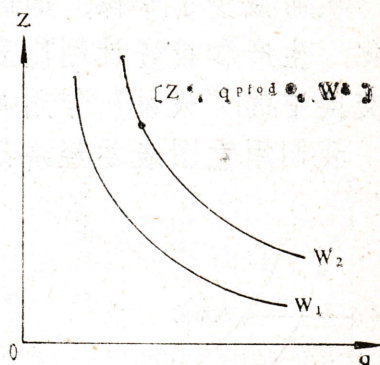
我们用 Z^* 表示短缺强度的正常值， q^{prod*} 表示生产性滞存的正常值， W^* 表示摩擦的正常值。短缺、滞存和摩擦的关系如下：



这就是体制的总摩擦函数。其中的解释性变量 q^{prod*} 只包括生产性滞存，不包括非生产性滞存。如果某种滞存在适当的时间内能够用于预订目的或密切相关的强制替代，这种滞存就是生产性的；反之，则是非生产性的。增加前者有助于减轻短缺，增加后者则没有这种作用。解释性变量 W^* 同短缺强度 Z^* 成反比关系。 W^* 的值越少，即买者的商品信息越充分，卖者对需求的预测越准确，买者的购买意图越少波动，卖者调节生产越灵活，调节所用的时间越短，短缺强度就越低。

当 $Z^* = 0$ ， $q^* = 0$ ， $W^* = 0$ 时，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就既无短缺，又无滞存和摩擦，因而处于瓦尔拉斯理想状态中。右图的原点表示的就是这种状态。它可以表示两类不同体制的理想状态。它可以是具有完全分散的决策，并具备无摩擦运行的一切条件的“完全竞争均衡”；也可以是掌握一切有关经济活动的信息，并能无摩擦地完美地行使职能的高度集中体制的理想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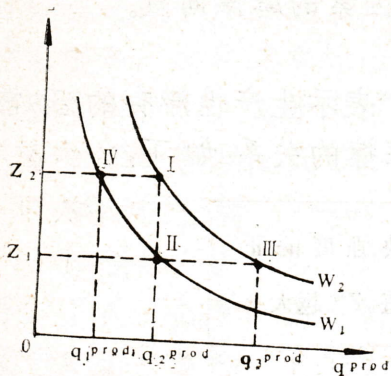
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无摩擦的体制，原点只是起参照的作用。我们用 Z^* 、 q^* 和 W^* 与原点的距离来描述现实体制的正常状态所处的位置。



摩擦与对滞存的“吸纳”

减少摩擦与增加生产性滞存对减轻短缺具有相同的作用。我们可

以用左图说明这一点。短缺强度由 Z_2 降到 Z_1 ，可在摩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增加生产性滞存来达到，即沿着等摩擦曲线 W_2 ，由I移动到III；也



可以在生产性滞存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减少摩擦来实现，即整个等摩擦曲线发生变动，由 W_2 平移到 W_1 ，从而I变到II。

IV并不是为逻辑上的彻底而虚构出来的。虽然短缺、滞存和摩擦都有其正常值，但短缺的正常值最大地显示出对变化的抵制。某领域中摩擦的减少并不能持久地消除该领域的短缺。因为这里短缺强度的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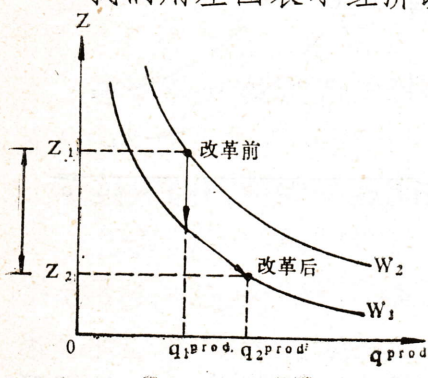
低，会导致把注意力转向其它领域，等其它领域的情况好转了，这里的问题又变得严重了。

生产性滞存的数量对既定的摩擦来说，不是短缺强度的最终调节器。它只是产生短缺现象的复杂因果链中的最后一环。因果关系的说明必须解释不断从生产和交换中“吸纳”生产性滞存的机制，即说明数量冲动、紧计划、囤积倾向、企业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等等。

滞存和摩擦也是相互作用的。生产性滞存越小，调节就越困难，调节中的摩擦就越大。生产性滞存可以充当使各种干扰不扩散的缓冲器；生产性滞存不足，则会使摩擦更多地溢散。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官僚主义束缚，企业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从而减少了摩擦。同时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在六十年代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和投资计划比五十年代更稳健了，数量冲动减弱了，生产和交换中的“吸纳”作用减弱了。

我们用左图表示经济改革和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图上可以看出，改革后等摩擦曲线 W_2 平移到 W_1 ；沿着等摩擦曲线 W_1 ，生产性滞存从 q_1^{prod} 移动到 q_2^{prod} ，从而使短缺强度从 Z_2 下降到 Z_1 。



总之，任何体制中都存在摩擦，但不断“吸纳”生产性滞存却是资源约束型体制中特有的。本书试图揭示这样一些机制，它们扩大普遍存在的由摩擦引起的短缺，

并再生产经常的、强烈的，而不是零星的、轻微的短缺。

第九章 投资者：制度结构

本章和下一章讨论投资，重点是与本书主题即短缺和数量调节有关的问题。本章我们抛开投资决策的内容，首先考察投资决策的制度结构和投资者（包括一切作出投资决策的机构和个人）动机。决策者行为是这里考察的中心。

这里着重描述的是典型化的传统控制机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不能独立作出投资决策，这一权力属于政府和各部委。我们把向上级争投资的企业和非赢利机构叫做要求者，把其上级叫做分配者。

要求者行为：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

马克思指出了驱使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积累的“动物本能”。那么，驱使对利润并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者进行投资和积累实际资本的又是什么呢？

第三章对企业经理从事当前生产的动机所说的话，在这里也同样适用。领导者，无论他是负责一个车间、一家工厂，还是一所医院或一所学校，其最重要的动机总是与自己的工作结为一体。他深信自己单位的活动很重要，应该得到扩展。同时，他受到单位内部的压力，相信通过投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领导者有一种职业的羡慕心理，他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的威望：喜欢炫耀新机器、车间和厂房。为此就需要投资来实现这种欲望。

短缺也会使领导者感到有必要通过投资来扩大某产品的供给，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保证本单位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

以上都是高尚的动机，但也可能有不那么高尚，但属人之常情的动机：（1）领导者的权力、名望和地位随企业的发展而增长；（2）较大的权力可能带来较高的物质报酬即较高的薪金、奖金和特权。这两项只是次要动机，因为即使争到投资并不给领导者带来更大的权力和收入的情况下，他照样会去争投资。

企业领导者知道，在要求投资方面，下属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下属判断一个领导者好坏的通常标准之一，就是他能否为本单位争得大量的投资。

概括起来，我们把上述各种动机的共同作用称为“扩张冲动”(expansion drive)。这一行为方式本来由社会关系事前决定，但由于它已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企业领导者的思维和日常活动中，以致于成为一种“自然本能”。扩张冲动与数量冲动和囤积倾向一起，造成生产领域中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和吸纳状态。扩张冲动比数量冲动和囤积倾向更重要，因为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强烈，正是扩张冲动才说明了不可满足的投资饥渴。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指出有限的物质资源不能满足无限的投资需求。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使要求者自愿限制其投资要求的有效约束。

应当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个企业都受到扩张冲动的影响，而投资需求又不会因担心亏损或破产而受到限制，因此也就没人自愿放弃投资。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投资对于要求者是一种赠品，这一事实必然导致上述结果。

分配者行为：紧投资计划

资源约束型体制下，投资分配者的扩张冲动一点也不亚于他的下属。在较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留下2%—5%的投资额作为储备。

然而几乎所有投资要求者都低估预期成本。精神分析法可能会揭示出要求者这一心理偏差是有意识的，还是受“潜意识”驱使的。但是，低估成本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因为预期成本越低，投资项目获准的可能性就越大。预期成本一般与实际成本相差在20%—30%，相差50%也不罕见，这种差别部分地与价格上涨有关，其余则反映了对成本的低估。

实际投资经常和大量地超出计划水平本身就足以说明投资品市场上持续的短缺现象。而计划外项目的挤入则会进一步加剧短缺。有许多因素会导致计划外项目的挤入。如，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考虑不周需要对在建项目追加配套工程，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有利的投资机会，政界领导人或议员向群众许了愿，然后就向经济部门施加压力，要求上新项目，等等。所有这些都得在早已用完的投资额之外追加投资。

从要求者的观点来看，投资是包含若干次战斗的长期的战役，但是只有第一次战斗是决定性的。投资一旦开始，就会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中途可能有等待，但很少可能完全停止。从分配者的观点看，这意味着每一计划期之前，下一期投资额中有相当一部分

必须用于继续完成在建项目。计划外项目挤入越多，投资额就越分散在已开工的为数众多的项目中，建设周期被拉长的项目就越多，结果下一期投资额中已指定用途的部分就越大，从而分配者安排投资项目的自由度就越小。这必然导致紧投资计划，使分配者根据情况变化作长期调节更加困难。

作为要求者的分配者

低中级分配者对下是分配者，对上及要求者；对下他们拒绝某些投资要求并同下级讨价还价，力图压低给下级的投资分配额，对上则提出比希望批准的更高的投资要求，因为他们估计高出的部分会被砍掉，他们也不在乎成本估算过于乐观，因为这样批准的可能性较大。

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作出选择是个内在的难题，但这一难题只出现在决策等级的最高层，因为只有他们才既对投资负责，又对消费、国家外贸地位和国防等等负责。而对各个局部的负责人来说，这些难题则是外在的。作为消费者，这些负责人当然对发展消费感兴趣；作为公民，他们懂得外贸收入和国防的重要；作为经验丰富的经济领导者，他们清楚地看到投资与其它生产和消费目的争夺资源，但是他们的社会职能比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态度或他们对经济关系的公正理解要强有力得多。他们必须为争夺投资，发展自己所负责的部门而战。

投资紧张

匈牙利经济管理人員和经济学家都用“投资紧张”（investment tension）这一术语来简洁地表示一系列复杂现象，它包括：（1）在正式审批投资项目过程中，投资要求总是大于可供分配的投资总额，投资要求与投资分配额之间存在紧张；（2）许多已获批准的投资项目不能按计划的投入产出组合和时间表进行，投资计划紧张；（3）生产和销售投资品的企业不能充分满足投资项目已获批准的企业对投资品的初始需求，投资品供应紧张。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中，短缺与投资紧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特殊的恶性循环。短缺感是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主要动力之一，短缺信号在投资选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短缺导致投资紧张。同时投资越紧张，人们就越把资源转到投资领域，从而又加剧了普遍短缺。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刺激私人投资，并使国家更

多地参加投资活动。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来不需要刺激投资意图，因为存在不断的自我刺激。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增长的不可抗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是，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一强大力量，也导致短缺的持续再生。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变化

1968年匈牙利改革后，纵向控制过程中决策权限的划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企业自主决定并完全靠自有资金投资的比例增加了。在资金总额中，需要偿还的贷款的份额相对于国家拨款增加了。但是对很大一部分投资决策，中央部门仍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些投资项目仍由中央部门决定；对不属于中央决策但企业单靠自有资金无法进行的项目，通过批准或拒绝贷款和国家补助，中央部门仍能施加影响。

改革试图使企业直接面对投资和消费选择难题。企业有一定的自由，决定其利润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增加个人收入。国家则通过调节税收来影响这一过程。

改革似乎把投资领域从某些官僚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使投资选择、项目开工的决策及其实施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另一方面，投资紧张仍然存在，虽然其期间平均强度有所减缓。这表明改革还不够深刻，还不足以消除使投资紧张再生的因素。企业和中低级管理部门的投资行为和动机并没有改变。

投资周期

在理论分析中，长期历史变化严格区别于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短期周期性波动。在短期内，经济系统围绕这一时期特定的正常标准，并在其容忍限度内波动。而在长期，中央增长政策及其组成部分投资政策，以及控制机制内有效的正常标准和容忍限度也在变动，但它们是围绕长期特有的趋势值变动的。

匈牙利改革前后都存在投资周期。

在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处于高涨状态，批准上马的项目越来越多，在建总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对这种突发性扩张的容忍限度为止，有三种特别重要的容忍限度。

(1) 外贸和国际收支状况变得令人担忧。容忍限度的准确位置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如果经济管理人员觉得赤字和债务令人担忧并

希望进行强有力的干涉的话，投资就会受到遏制。投资主要是通过进口机器对国际收支产生重要影响。

(2) 投资项目与家庭消费争夺资源。这里的容忍限度同样没有明确的规定。它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局势，居民愿意接受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是多少，什么时候会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在哪一点上会危及制度的稳定性。历史上有过群众不满太大，迫使领导人改变经济政策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限制投资似乎又是最明显的解决办法。因为限制投资可以节省进口机器的外汇，用于进口消费品，直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3) 投资实施过程中往往碰到资源约束和瓶颈。投资越紧张，这类现象出现越频繁，最终会达到经济管理人员和施工单位无法容忍的地步，从而限制投资。

所有这三种限度代表社会可接受的限度。政府领导人、经济管理人员和群众舆论认为侵犯这些限度是不能容忍的。即使经济发展中只碰到这三个限度之一，也可能出现紧急“刹车”。一些项目停建、缓建，另一些项目不上马了。投资总规模不一定下降，但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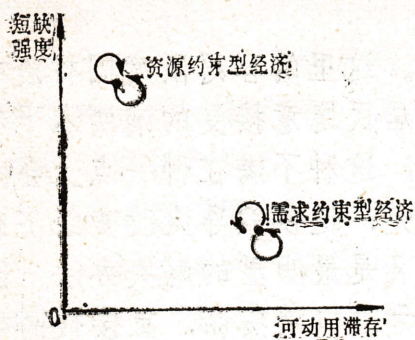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由于先前侵犯容忍限度引起的震荡慢慢减弱了，同时开始出现短缺和投资紧张低于正常标准的相反信号，于是人们逐渐感到计划太松了，滞存太多了，还有投资潜力。这种乐观情绪不断高涨，突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决心，并给投资活动注入新的动力，投资周期又重新开始。

干预的突发性，两种调节手段（“紧急刹车”和“加大油门”）的交替使用，会使整个经济系统发生震荡。

最后我们把以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代表的资源约束型经济同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代表的需要约束型经济加以对比。这两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别，如当事人的动机不同，信息和控制机制不同，国家的作用和社会因素不同，等等。这里不考察这些差别，只考察一点，即在短缺和滞存指标的正常值方面是否存在一种特征性的差别。

我们用下图来说明两种周期的差别。显然，二者围绕各自不同的正常状态波动。在古典需求约束型体制下，存在相当数量的可动用滞

存，短缺只是偶然出现，即使在高涨时期也很少碰到资源约束，而在周期的谷底，滞存则显著增加。传统资源约束型体制则相反。即使在周期的谷底，可动用滞存也很少；在周期上升阶段，生产经常碰到资源约束；在波峰，这种约束变得非常严重。短缺现象在周期最低点也很明显，而周期最高点，在一些部门会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第十章 投资者：长期调节

本章是上一章的继续，回答投资决策的内容是什么，即回答依据什么标准和信号分配投资的问题。

出发点：按过去比例分配

在各级投资要求者之间分配投资额所依据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方法：每个要求者都应得到同去年大体相当的投资。由于投资项目不可分割，这个方法在分配的最低层次实际上行不通。于是这个方法就变形为，今年把投资项目给企业A，明年给企业B，等等。这种做法的危险是使现有分配比例僵化，增加长期调节的困难。

投资分配是多步决策过程。按过去比例分配只是程序的第一步，以后几步将决定在什么地方、何种程度上允许与上述原则偏离。

根据短缺信号调整投资比例

影响投资分配同惯常比例偏离的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关于短缺的信息。人们往往根据短缺信号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以及各类投资间的比例作出调整。

有两类短缺信号。一类是人们直接感觉到的短缺，是人们的初始购买意图与其实现之间的偏差。这种短缺只存在于人们预先存在明确的购买意图，并且其实现可以度量的情况下。另一类是人们间接感到的短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初始意图，短缺是由日益严重的社会后果逐渐显露出来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短缺主要出现在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服务机构。例如，一段公路的利用程度可以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通过较少的车辆，也可以通过较多的车辆。这段公路的利用度越

高（即公路越拥挤），司机通过这段路花费的时间、支出的脑力和体力越多，消耗的汽油越多，发生事故和车辆损坏的可能性越大。这些都是通过这段路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以货币成本的形式出现。公路的“短缺”正是通过随着公路利用度的提高，社会边际成本不断提高来表现的。当利用度接近极限时，社会边际成本就会急剧上升。

“延期—救火”循环

对类似于公路建设那样的项目，投资分配者面临通过增加投资使社会成本减小，还是推迟投资，听任社会成本增加的选择。

我们把推迟投资叫做“延期”（postponement）。延期的好处是可以节约投资，坏处则表现为社会边际成本的提高。但是因为：（1）延期带来的好处是确定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节约的投资数额，而坏处却不那么确定，社会成本的增加大部分不能用货币形式表现；（2）延期的好处对投资分配者是“内在的”，能够扩大他们集中支配资源的自由度，坏处对他们则是“外在的”，分散在千百万个企业、非营利机构和家庭；（3）延期的好处是现时的，而坏处则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所以，投资分配者在许多经济领域中，都往往倾向于延期。延期会一直持续到社会边际成本的增加碰到容忍限度。这个限度实际上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困难倍增，人们的意见越来越大，甚至出现某些重大事故。这些后果可能引起某些负责人或舆论工具的重视，从而使投资开始。这种投资有点类似于“救火”。把投资投入这些部门或企业并不是想有意识地发展它们，而是因为这些方面的短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已经无法容忍。在短缺和投资紧张的条件下，几乎不存在可自由动用的投资资源，因而只能靠延缓短缺尚可忍受的部门的投资，以便把资源用于“救火”。这里的“火”刚救完，那里又起“火”了。延期和救火，互为因果，持续再生，形成周期性循环。

这个循环是“短缺—投资紧张”恶性循环的局部表现或亚循环。只要短缺和投资紧张存在，“延期——救火”循环就必然存在。计划和专家的远见也许能减轻它，但不可能消除它。这也许是一种“痛苦的”发展形式，但不是“不合理的”。经验表明它是可行的。虽然存在滞后，这种机制却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调节任务。

第十一章 就 业

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充分就业。本章分析保证持续充分就业的机制及其有关的现象。这里主要是对长期过程作宏观经济分析。

需求约束型和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

我们用 $L(t)$ 表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H(t)$ 表示经常就业的人口，正常参加率 $h^*(t)$ ，即经常参加工作的人口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比率如下：

$$h^*(t) = \tilde{H}(t) / \tilde{L}(t),$$

式中的 $\tilde{H}(t)$ 和 $\tilde{L}(t)$ 是趋势值。

需求约束型劳动市场的“典型”是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其特征如下：

(1) 最重要的特征是正常参加率 h^* 在长期中虽有增长，但相对较低。经常存在大量储备劳动。

(2) 第二个突出特征是正常失业率大大超过摩擦引起的最小失业率。即使在经济高涨阶段，失业率也高于这个水平，这就是所谓长期失业。

(3) 第三个特征是，甚至有些经常性就业的人也可能失业。

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是因为生产是需求约束型，生产的扩展受到有效需求的制约。

需求约束型劳动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供求之间虽然存在相互作用，但需求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买方有利，对卖方不利。进行搜寻、等待、排队和强制替代（即干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是卖方。这里劳动需求是就业的有效约束。

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的情形恰恰相反：

(1) “纯粹”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的主要特征是，正常参加率相当高，储备劳动已吸收完毕。

(2) 长期失业被消除，即使存在瞬时就业波动，也总是在摩擦引起的最低失业率附近波动。摩擦失业主要是一个组织问题，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存在。它的大小取决于：(a) 劳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符

合的程序；(b)工资政策；(c)住房条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文化条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d)生产结构的变化；(e)信息交流的情况。

(3) 没有来自潜在储备劳动的有力竞争，经常性就业人口的就业有保证。

劳动短缺和“在职失业”

在正常摩擦和正常参加率已定的条件下，一旦纯粹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确定，就不再有储备劳动可动用。整个经济体制的当前生产和经济扩展，都会受到劳动短缺的制约。这里劳动供给成为就业增加的有效约束条件。

尽管劳动长期短缺，企业外部不存在劳动滞存，但其内部却存在劳动滞存。这被称为“在职失业”。

劳动短缺和“剩余”不仅同时并存，彼此间还存在因果关系：劳动短缺越严重，在职失业（即内部滞存）就越严重。

(1) 相当一部分在职失业是缺少互补投入引起的。例如，某些工人不能工作，是因为必须一起工作的同事未来上班，或者是因为缺少原材料或零配件。

(2) 长期和严重的劳动短缺会松懈车间纪律，降低工作质量，减少工人的勤勉。工人的绝对就业保证，会助长某些人的无责任感，并使管理人员难于采取行政措施。

(3) 在传统体制下，劳动力由中央统一分配企业，如果放弃多余劳力，较少的人员定额就可能列入下一期计划。所以保持多余劳力是值得的。

无论改革前后，劳动力严重短缺必然导致“囤积劳动”。这又会加剧在职失业。劳动短缺和囤积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由需求约束型向资源约束型劳动市场过渡

匈牙利1972年以前基本上属于粗放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系统的特征是，子系统劳动市场是需求约束型的，而其它子系统却是资源约束型的。

如果“环境”即系统中的其它市场或分配子系统是需求约束型的，那么作为分配子系统之一的需求约束型劳动市场就会成为持久的正常状态。相反，如果其它市场或分配子系统都是资源约束型的，那

么劳动市场或分配子系统迟早会转变为资源约束型的。因为几乎无止境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迟早会把劳动储备吸收殆尽，从而使劳动短缺成为正常状态。

人们普遍赞扬社会主义国家“明智的就业政策”，但这种赞扬不应归于政策，而应归于体制。正是这种资源约束型体制保证了“充分就业”，但同时它也维持了长期和严重的资源短缺。我们想要“充分就业”，而不想要劳动短缺是不可能的，它们似乎必然要一起出现。

第十二章 作为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函数的社会效益与成本

在第十章，我们用公路的例子说明了生产能力利用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在那里可以看到，超过一定的利用度，边际社会成本就急剧上升。我们在这里把这种关系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社会生产能力及其利用度

生产能力是在既定技术可能性下，可以达到的最大可能产量。我们用 X 表示某一体制下生产能力实际达到的水平，用 \hat{X} 表示这种体制下生产能力发挥的绝对上限，用 K 表示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度，它们之间有下述关系。

$$K = X / \hat{X}, \quad 0 \leq K \leq 1.$$

我们感兴趣的是生产能力利用的相对水平，即生产能力利用度，因为它能表明经济体制的特征。宏观经济学和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常用描述人力资源的利用状况的“就业”概念来说明某种体制的特征，而我们认为应当用描述各种资源利用状况的“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度”来说明这一点。用“失业”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只说明了一种局部现象，更全面地，则应当说它的特征是社会生产能力的低利用。

社会生产能力利用与社会效益和成本

一切有助于个别社会成员或集团的福利、愉快和满足的现象被称为社会效益；而涉及个别社会成员或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和辛苦的现象被称为社会成本。二者中包括了通常不用货币表现的一些因素。

社会效益是生产能力利用的函数。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么较多

的产品，较快的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就可视为“效益”。劳动就业也是社会生产能力利用的函数。充分就业不仅意味着生产和消费增长，还带来有利的心理影响。它增强了安全感和人类尊严，还为妇女的平等权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把它列为效益中单独的一项。

社会成本也是社会生产能力利用的函数。随着生产能力利用度的提高，边际社会成本可能递增、递减或不变。我们把社会成本分为四组。

第一组社会成本是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投入，包括各种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我们强调，递减和递增的成本在生产过程中都会作为生产能力利用的函数出现。但是，生产能力的利用越接近极限，即利用度 K 越接近1，边际成本的上升就越快。

第二组社会成本也同企业活动有关，但不直接以货币形式出现在它们的帐目上。这种成本在微观经济学中叫做“外部不经济”。它包括生产能力紧利用，对工人健康状况产生的有害影响，生产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损害，等等。

这组社会成本属于递增的边际成本。当趋近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度极限时，它们会急剧上升。

第三组成本是政府机构的维持费用，属于一般社会管理费用。如果生产增长，单位产品所含的一般管理费用便会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递减的社会成本。但是当生产能力利用度 K 趋近1时，资源约束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会大量增加，协调、组织和管理工作会更加困难，因而递增的边际成本同样也会出现在政府支出领域。

第四组社会成本涉及社会心理方面。人们的意向、满足和普遍感觉反映着大量同社会生产能力利用有关的现象。

就业增加，会减少同失业有关的有害行为和心理影响。从这方面看，第四组社会成本随生产能力利用度提高而降低。但是，当利用度 K 接近1时，生产频繁地碰到资源约束，也会造成紧张气氛。短缺、强制替代、凑合、突击，会使人们工作时急躁、轻率、烦躁；人们作为买者要排队、等待、搜寻和强制替代，也给他们带来痛苦；经常加班加工作会使士气下降；投资吞噬用于消费的资源，使生活改善不快，也会影响群众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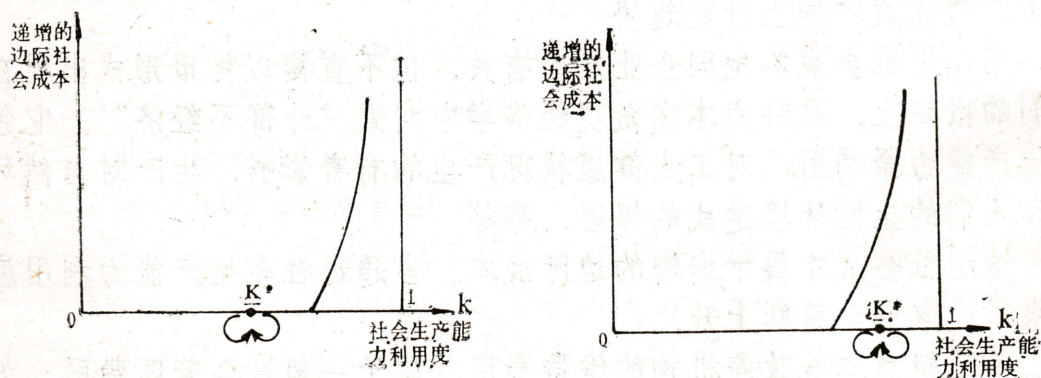
从上述对社会生产能力利用与社会效益和成本之间关系的分析

中，可以得出一个平凡而又极其重要的真理：不应当不惜一切成本去达到社会生产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当趋近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边际社会效益，就不值得把生产能力的利用度提高到那一点。

经济体制比较

如果一种体制的生产能力的利用度已经接近于 $K = 1$ ，急剧上升的社会边际成本已经存在，我们就说该体制下，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是紧的。

我们用下图来对比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度。



(a) 古典资本主义经济

(b)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从图中可以看出，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常的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度 K^* 较低，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 K^* 较高，已经接近1；在前者中， K^* 处于边际社会成本急剧上升的区间之外，而在后者中， K^* 已经处于这一区间之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是紧的。它的生产能力利用度的边际提高，或者说，边际社会效益，是以急剧提高的边际成本为代价的。

“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并不等于单项资源瞬时利用的加权平均数。因此正常利用度 K^* 接近于1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对各种资源的利用都达到了或几乎达到100%。大量滞存存在着，但无法动用。物质资源约束每时每刻都作为成千上万亚微观层次上的瓶颈出现。就一段时期平均来说，有许多资源很大程度上不能利用，与此同时，生产能力利用 K 的值又接近于1。这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可以彼此相容。

我们说社会生产能力利用度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高于在古典资本主义经济中，并不涉及这两种体制的“效率”。我们只是想通过对比社会效益和优点，以及社会成本、负担和缺点，来说明较高或较低社会生产能力利用所产生的不同后果。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消灭失业所产生的好处比短缺所带来的缺点更为重要，但人们并不总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对于为物资短缺而烦恼的公司职员和得不到住房的年轻夫妇来说，即使提醒他们应当为消灭了失业而高兴，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安慰。

第二篇 有价格存在时的调节

第一篇略去了利润、价格、工资和货币的作用，本篇的任务是把它们纳入分析范围。因为对它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尚有疑问，所以篇题不用“通过价格调节”而用“有价格存在时的调节”。

第十三——十五章考察企业部门，某几处也涉及非营利机构部门。第十七——第十九章的主题是家庭部门。居二者之间的第十六章考察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付给家庭的工资。

本书最后三章涉及所有部门。第二十章讨论货币，第二十一章探讨宏观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最后，第二十二章分析几个制度背景方面的问题。

第十三章 企业：预算约束和利润

本篇从考察预算约束和利润开始，是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要作为分析价格、工资和金融问题的基础。

预算约束的硬与软

我们用以下的公式来表示企业的总预算约束：

$$\boxed{\begin{array}{c} \text{在 期 间 } t \text{ 的} \\ \text{总 支 出} \end{array}} = \boxed{\begin{array}{c} \text{原 有 货 币} \\ \text{存 量} \end{array}} + \boxed{\begin{array}{c} \text{在 期 间 } t \text{ 的} \\ \text{总 收 入} \end{array}}$$

要使上述预算约束成为完全的硬预算约束或近似硬的预算约束，

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

(1) 企业不能决定投入品和产品的价格；或者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制定价格。

(2) 税收制度是硬的，即：税则的制定不受企业影响；税收额的确定以各种可观察可度量的客观标准为依据；企业不应得到例外的、个别的免税；严格按照规定征税。

(3) 没有无偿的国家拨款。

(4) 没有信贷；或者只有能保证按时还本付息，才能得到贷款。

(5) 没有外部的投资资金；或者外部的投资资金只能用于企业发展，而不能用于应付短期资金困难。

如果遵守这五条，预算约束就成为事前的硬的或近乎硬的行为约束。这会带来以下后果：

(1) 生存。硬预算约束是一种经济强制形式，企业能否生存取决于它能否以销售收入来抵补投入成本。

(2) 增长。企业扩展所需资金，只能来源于其内部的积累。

(3) 根据价格调节。企业是价格的接受者，只能根据价格的变动去调节投入产出构成和产量。

(4) 不确定性。企业独自承担外部环境变动和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和风险。

(5) 企业的需求。上述各种后果意味着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它取决于投入品的购买价格和企业的当前和预期收入。

使预算约束完全变软，即不能事前约束企业行为的条件如下：

(1) 企业不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

(2) 软税收制度，即：企业可以影响税则的制定；可得到免税、缓征等优惠；税收不严格。

(3) 国家的无偿拨款，包括：没有偿还义务的投资拨款；用连续长期补贴来弥补长期亏损或在较长时期中鼓励某种活动；用临时补贴来弥补暂时亏损或鼓励某种活动。

(4) 软信贷制。无偿还能力也能得到贷款并能拖欠贷款或其它应付款。

(5) 软条件的外部投资。

软预算约束会导致以下后果：

(1) 生存。企业的生存不仅仅取决于能否用自己的收入来弥补支出。利润对企业不再是生死悠关的事。

(2) 增长。企业扩展所需资金不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积累，还取决于国家无偿拨款和软投资信贷。

(3) 企业用不着根据价格去调节生产。作为产品价格的制定者，企业可以把投入品价格的增加加到产品价格上。即使由于忽视价格而蒙受了亏损，也还可以向国家求援。

(4) 不确定性。企业不单独承担风险而是同国家分担。企业多收不一定多得，亏损则可向国家转嫁。企业收入不断被再分配。

(5) 企业需求。由于上述后果，企业的投入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投入品价格和预期收入不形成有效约束。企业预期迟早可以弥补投入成本。即使入不敷出，也可以由外部资金来弥补成本。

软预算约束不能在实际生产和交换中约束企业。它不是有效的行为约束，只是作为会计关系存在。

使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和反趋势

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十九世纪接近于完全硬的预算约束，而后来的趋势是逐渐软化。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并不存在企业的预算约束完全软化，其生存自动得到保证的情况。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目前的预算约束仍可看作“近乎硬的”。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约束，我们的基本假说如下：

(1)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2) 象匈牙利1968年改革那样的局部分散化改革，使企业的预算约束有所硬化，但它基本上仍是软预算约束。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统负盈亏，企业“独立核算”的原则只是形式上的，因而企业的预算约束不可能成为硬的行为约束。匈牙利改革后，主要是国家对企业的收入再分配，造成了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在各种名目下，通过各种渠道，企业总利润的一半以上被再分配，最终结果是：高赢利企业的超额利润被抽走，低赢利和亏损企业得到补贴。

再分配可以通过成千种或大或小的措施来进行。其中每一项都可

用特殊的理由来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在各种直接理由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普遍和深刻的动机。我们指出其中的三个：

(1) 寻求稳定性。它暗含着每个企业，甚至每个岗位的“稳定性”。这种努力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减少了无保障，经理和工人都没有必要担心企业倒闭，不仅就业有保证，连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有保证；另一方面，这样多的保障使企业日益衰落，再也无需为生存而奋斗了。

(2) 希望收入平均化和坚持社会主义工资原则。“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有表现的不同即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不同，收入差别才是正当的；而好运或坏运、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造成的差别，则是不正当的。因此客观条件造成的困难不应由企业负担，而应由社会共同负担。追求收入平等化，一方面满足了许多人的“公正感”，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利润、价格和成本的刺激作用。

(3) 加强再分配部门的地位和作用。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企业在经济上依赖于市场；而在软预算约束和对企业收入实行大规模再分配的条件下，企业则依赖于再分配部门。传统体制下企业对计划讨价还价；现在则是对再分配讨价还价。企业希望国家多给点钱，少拿点钱。在投资方面，企业自有资金比重很小，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信贷和国家投资，这就使中央计划和财政部门在再分配投资资金时起重大作用。

在存在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强大趋势的同时，也存在相反的趋势。

作为改革的结果，利润原则的地位提高了。这部分地在中央部门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在给予信贷、制定外贸计划和作出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赢利性，这即使不是作为主要的标准，至少也是次要的标准。

抵销预算约束软化的趋势也在企业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这里最重要的是企业独立性的要求。不超出预算约束就可以减少向国家请求和讨价还价。与利润相联系物质刺激，如，同利润挂钩的经理奖金、利润分红、福利基金，等等，也是抑制预算约束软化的力量。

这些相反趋势的存在，正是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说，即改革使预算约束有所硬化的依据。

预算约束软化与利润刺激

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献中争论的焦点是“利润刺激”，而本书的焦点是：“预算约束软化”。这不仅是用语的不同，而且是论证逻辑的不同，以及解释性因素的重要性序列上的区别。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对增加利润感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决定他们的行为。当利润刺激和硬预算约束结合在一起时，他们的努力就被引向实际活动的轨道；当利润刺激和软预算约束结合时，这至少给企业操纵财务变量，提高价格，追逐国家“赠品”等等，以同样的活动天地。

影响社会主义企业的关键问题，不是经理是否可以从利润中得到相当于自己基本工资10%或50%的个人收入，也不是按什么公式在职工中实行利润分红，以及福利基金和利润税如何同利润挂钩。所有这些都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在硬预算约束下，即使企业经理个人的利润分红为零，他对利润也不会漠不关心。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与企业视为一体，要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没有其它办法，只能靠赚取更多的利润。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单纯变换术语，而是要把注意力引向这个事实：在理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两方面，主要的问题不是实际的刺激形式，而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预算约束在微观理论中的地位

关于经济当事人受预算约束制约的假设，在微观经济学中被视为公理。例如克洛沃就把预算约束说成象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样的基本原理。如果假定预算约束不存在，就会动摇现代微观数理经济学的基础，因为这个学说的所有主要成果，从供求函数性质的基本命题到瓦尔拉斯定律和均衡价格体系的决定，都与预算约束假定有关。

我们认为，预算约束的存在和作用不是关于经济体制的一般理论的公理性的出发点，而是一个经验问题。经验证明，在一定经济和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经济当事人受到预算约束的有效制约。但也可以证明，在另一经济和另一历史时期，经济当事人的决策和行动并没有受到预算约束的制约。从我们的分析中必然得出，正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约束相当软，概括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的瓦尔拉斯定律不再生效。但这种说法并不排除寻找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规律性。

在我看来，关于宏观“非均衡”状态的全部理论，无论对长期失

业和低生产能力利用的描述，还是对长期“过热”和短缺经济的描述都不能离开它的微观基础。体制的宏观状态与当事人的微观行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作用。宏观理论不应以存在着一切条件下都生效的微观行为方式为基础。以十九世纪中叶曼彻斯特纺织厂为代表的那类企业的行为方式，对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再生效，并且完全不适于用来描述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微观行为是历史的产物。它的所有重要成分（需求的形成，对价格的反应，等等）都依赖于当事人周围的社会现实，即微观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它受收入再分配影响的程度，它对价格的影响，买卖双方力量的对比，等等。反之，如果微观行为已定，它对体制的宏观状态也发生一定的影响。

第十四章 企业：对价格的反应

社会主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价格的制定，这种关系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对既定的价格作出反应，即价格信号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

我们的基本假说是，价格和非价格因素都对企业决策发生影响，这两种不同影响之间的相对强弱，取决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在短缺经济中，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价格因素的影响是次要的，而发生主要影响的是非价格因素。

价格与企业的瞬时和短期调节

微观经济学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说明价格变动的的影响。卖者价格水平的降低，相当于买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引起需求水平的提高；互替代品相对比价的变化，则会引起买者需求结构的变化。但是，这两种效应的存在是以买方市场和硬预算约束为前提的，因此并不适合于描述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

在投入方面，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在瞬时和短期调节中的价格反应相当微弱。经济强制的缺乏、转嫁成本增加的可能性、高短缺强度和调节中的摩擦，这一切几乎完全抑制了价格对企业选择投入组合的影响。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主要是根据短缺信号调整投入组合。体制改革后，企业对投入品价格变动的反应有所增强。但是由于预算约束仍很软、短缺强度和摩擦仍相当大，价格的影响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

阻抑。

在产出方面，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产出水平并不是由价格控制的。独立于价格的强大力量（如产量计划、数量冲动和排队的买者的压力，等等）把企业驱向紧生产能力的利用。生产能力的紧利用会导致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但这并不能阻止企业把产量提高到这种高度。这里不是根据价格调整产量而是根据高产出引起的高成本去调整价格。

改革以后，价格在控制总产量方面的作用似乎没有增长，并且各种特殊的利润刺激形式还会刺激企业增产。但是，在产出构成的瞬时和短期调节方面，价格的影响增强了。

投入和产出方面价格反应的不对称

受需求制约的企业必须按买者的需求来决定产出构成。它希望获得最大利润，但也可能愿意生产利润较小的产品，因为这会使企业扩大销售，占领市场。然而受资源约束的社会主义企业不必按买者选择来决定产出构成，因而比资本主义企业更能按利润原则来决定生产什么。这不是因为它“比资本家更资本家”，而是因为它在短缺经济环境中运行，不会遇到销售困难。

在企业作为买者不能根据相对价格选择投入组合的同时，在产出构成的选择方面它却受到相对价格的较强影响。这种投入和产出选择方面价格反应的不对称性，是短缺经济的必然结果。

价格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首先要强调的是在投资选择上不存在唯一标准来决定项目的取舍。投资决策者权衡多重标准，并用定性方式比较它们，最终在它们之间做出妥协。

在传统体制下，用现行或预期价格计算的赢利性标准不影响投资决策。投资的选择几乎完全是数量控制过程。国民经济平衡关系、短缺信号和决策者追求“现代化”的偏好等非价格标准在投入决策上起决定性作用。各种主观因素也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例如各企业领导人威望的不同，高级领导人对企业的熟悉程度不同、支持和干预程度不同，都可能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很可能投资并未流向最急需的单位，而是流向最能对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单位。当然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改革后赢利性标准对投资（特别是对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影响有所增强。但同非价格标准相比其影响仍弱得多。

相对价格和短缺

在考察了企业在当前生产和投资两方面的价格反应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一种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提出挑战。按照这种观点，错误的相对价格是造成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全部制度条件、控制机制、企业的动机和行为方式不变，那么，无论相对价格怎样变化，都不可能消除企业部门的短缺。

我们的主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在软预算约束下，企业对当前生产投入品和投资品的需求是几乎不可满足的。调整产品的相对价格，可以影响产品之间的相对短缺强度，但不会消除整个企业部门，以致整个经济中的短缺。

第十五章 企业间价格的形成

本章研究企业之间交换的中间产品价格的形成。我们希望描述和说明短缺经济中价格形成的机制和价格变动的趋势。

容易管理的价格和难于管理的价格

政府的价格管理部门要制定某种产品的价格并保证其实行，必须做到：（1）准确、清楚和全面地规定这种产品的质量；（2）检查是否产品质量和价格同规定相符，如果不符，就要强制卖者执行政府的规定。

有两大类产品：一类是大批量的标准产品，如，大部分原材料、某些半成品和加工深度较低的传统食品。这类产品比较容易满足上述要求。只要规定几个参数就能描述其质量标准。另一类是差别产品，如机械工业和建筑业的许多产品。其质量标准得用相当多的参数才能准确、清楚、全面地加以描述，从而很难满足上述要求。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有关政府价格控制的重要结论：政府对标准大批量产品容易实行价格控制，而对差别产品则很难做到这一点。产品差别越大，越难于用行政方式规定价格并保证其实施。生产者很容易通过产品改型或使用低质原材料来变相提高差别产品的价格，因为几乎不可能严格规定并经常检查这类产品的质量。

从历史上看，大批量标准产品的种类增长不快，而差别产品的种类却迅速增长。这是技术进步、生产和消费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只要一个国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国家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然而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国家将越来越难于控制日益增长的那部分产品的价格，国家能有效控制的价格在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将持续减少。

管理价格、虚假管理价格和契约价格

管理价格是物价部门制定并能保证在实际交换中得到遵守的价格。

契约价格是买卖双方协议的价格。它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同时也受到中央价格政策和措施的影响。

虚假的管理价格表面上是物价部门决定的，但实际上物价部门既不能严格规定它的质量标准，又无法保证这些标准得到遵守，因而只是对买卖双方协议的价格加盖“橡皮图章”。

对差别产品实行国家订价实际上是一种幻觉。国家充其量只可能管住其中一小部分，而其余大部分不是契约价格，就是虚假的管理价格。匈牙利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对相当一部分产品放弃了这种幻觉。例如，对机械工业和建筑业的许多产品，不再实行国家订价。

短缺经济中衡量价格水平的困难

通常衡量价格水平遇到的困难是，当产品构成持续变动时，几乎无法弄清价格的变动反映的是质量的变化，还是单纯的价格涨落。

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计量学家把价格与产品质量联系起来。当顾客愿意为产品A支付比产品B更高的价格时，就说A的质量比B好。两种产品的消费者评价不同，反映两种产品的质量差别。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买方市场存在的情况，在长期短缺条件下，如果买者由于买不到B，不得不买A，那么A与B之间的价差就不能反映两者之间的质量差别。

分析价格水平必须比较不同期间产品的价格。但能跨期间比较的产品往往是大批量标准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资本可以在部门间转移，这类产品不可能长期利润过高或过低。这样，对这类产品价格观测资料，就能代表一般物价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情况则不同。在价格统计资料中可跨期间比较的产品多少同价格容易管理的

产品相吻合。对这类产品国家能有效地实施价格管理，抑制其价格上涨，而对实行契约价格和虚假管理价格的产品则无法抵制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引起的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统计以可跨期间比较的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代表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那么，价格指数必然偏低。

企业利益与价格上涨

社会主义企业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都有提高价格的欲望。在传统体制下，最重要的计划指标是总产值，为完成这个指标，企业愿意使用相对昂贵的材料，从而导致产品价格提高。计划指标还包括资金、成本和利润指标，它们的完成也影响到企业的决策，甚至企业的财务状况，这就使企业力图隐蔽地提高价格。改革后企业同利润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会刺激它生产利润高的产品。这本身就会使平均价格水平提高。而通过提价来取得更高的利润，对企业又是最省事的。我们的假说是，对利润的关心即使不同预算约束实质性的硬化相结合，也会加强提价倾向。改革以来，卖者提价和买者抵制高价的意向都加强了，但前者比后者增强的更多。

企业的提价努力表现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具有软预算约束和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的买方企业，不仅会容忍卖方提价，而且会自己高价抢购。这就会导致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买者敢于出高价是因它能作为卖者把成本的增加转嫁给自己产品的买者，这已经是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这种类型的价格上涨，除了同企业外部的投入品涨价有关，还同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的紧利用有关。企业的超负荷运转，导致边际成本急剧上升。短缺通过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这两条因果链，驱使物价水平上涨。

国家对企业间价格的干预

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价格稳定。即使它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标，至少也要抵制价格的螺旋上升，并使之保持在计划允许的上升幅度之内。如果其它目标与此发生矛盾，价格稳定总是优先得到考虑。

中央价格政策的主要措施是：

(1) 规定管理价格。它适用范围不广，然而可能非常有效。最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半成品的价格容易得到管理。固定这些价格，

对于以它们为投入的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能起稳定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差别的扩大，这种手段的作用会递减。如果物价部门仍企图靠这种办法稳定价格，虚假的固定价格将大量出现。

(2) 如果成本推动的趋势很强，中央部门可以通过补贴、减免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阻止价格上涨，不过，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具：一方面，一笔适当时间和地点发放的补贴可以打破“成本，价格，成本”螺旋；另一方面，补贴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导致短缺的长存，从而扩大了长期的价格上涨倾向。

(3) 同上述直接方法一起还有一些间接方法。如，计算成本的方法，即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计入成本，以及可以附加多少利润。如果经常核查，违反规定必究，就能有助于抑制企业的提价。国家干预还可以通过控制舆论、通过报刊和政治组织来形成一种谴责公开或隐蔽提价的“社会气氛”，这也有助于阻止价格上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部门不是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用价格和工资政策来抵制企业内部产生的价格提高倾向。

消除失业和物价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大成就。但前者是靠经济内部的机制自动实现的，而后者是通过积极的政府措施才取得的。我们希望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保证价格和工资稳定的“内在”机制；相反，企业“内在”的机制和刺激会引起价格和工资的不断上涨。如果对这种上涨放松抵制，价格和工资的上涨趋势就会大大加强。在现实中，中央抵制和企业的提价倾向两者共同决定实际物价指数。

第十六章 工 资

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国营企业的工资。分析的问题主要是：中央工资政策；工资对劳动供求的影响；工资紧张与工资膨胀的趋势。关于短缺和数量调节与工资的关系，穿插在上述几个问题中讲。

中央工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乎没有任何指标比工资指标完成的更准确。这不仅由于这方面的预测更准确，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能够强制贯彻中央工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资货币”是与“非工资货币”严格分开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用于支付工资的货币与其它用途的货币明确划分开来。经济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例如：在计划、生产成本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工资货币都是单列的一项。“1福林=1福林”的原理不再适用，夸张地说，货币在国内也不再通用。

这种全面划分的做法本身就很重。它不仅使事实清楚地呈现出来，而且使每个决策者都考虑他的行动是否会增大居民的购买力。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阻止非工资货币被用于工资。

在传统体制下，中央用严格的条款规定工资基金，并严令每个企业遵守。限制企业开支总额的预算约束虽然很软，但对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工资基金的预算约束却很硬。体制改革以后，虽然中央不再严格规定工资基金，但仍对工资支出在若干方面加以限制。许多基金都不能用于工资，或者只能在详细规定的条件下用于工资。这样每个企业都必须积累“储蓄基金”，企业经理无权把这种基金分给职工。

法律和规章由刺激制度加以补充。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奖金总是与遵守工资纪律相联系。最初，他们的奖金视遵守绝对工资基金的情况而定。后来，各种相对指标也起一定作用，例如人均工资指标。还出现了一些把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做法，防止工资的提高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后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维持工资纪律，如，使对企业征收的利润累进税成为工资收入提高的函数。上述经济刺激还要用许多精神刺激加以补充。遵守工资纪律成为评价管理人员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下至车间主任，上至部长，概莫能外。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讨论中，人们尖锐地批评把“工资支出”和“非工资支出”分开，并在每一级管理层次上对“工资支出”给予特别重视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各级决策者对非工资支出抱随便态度，从而造成浪费。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许多西方人士对这种做法却加以肯定。他们认为提高工资的压力是造成“工资—物价螺旋”的主要原因，严格控制工资支出有利于价格稳定。

中央部门有贯彻其政策的有效手段，并不意味着政策可以任意提出。政策有一定的自由度，但也受到相当的限制。工资和消费的增长

具有不可逆性。它们具有自己的正常标准和容忍限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这种标准和限度可能有差别，但就短期而言，实际工资和消费的增长总是围绕着自己的正常标准，在自己的上下容忍限度之内波动。许多匈牙利计划人员认为，在过去的10—15年中，实际消费水平每年增长3—4%是“正常的”，增长2%是“可以容忍的”。遏制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使生活水平下降，迟早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从而迫使决策者作出调整。消费增长过快则会与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发生矛盾，于是要求国家量入为出的意见通常会促使决策者去控制消费的增长。

工资对劳动供求的影响

用马歇尔供求曲线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中工资同劳动总供求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层次上看，劳动总供求没有工资弹性，就是说，劳动总供求状况几乎不受名义工资或实际工资变动的影 响。在存在大量潜在劳动储备的粗放增长时期，劳动总需求是有效约束，并决定就业水平。而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决定就业。在劳动储备吸收完毕并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集约增长时期，对劳动的初始需求和修正过的需求都大于劳动总供给，从而供给成为有效的约束，并决定就业水平。这个时期尽管劳动总供给和就业水平相当稳定，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却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尽管工资总水平不能影响劳动总供求，但各部门、行业、企业和职业的相对工资水平却能影响劳动在这些方面的分配。就劳动需求而言，劳动需求无工资弹性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微观。相对工资的高低并不能制约存在软预算约束和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的企业。而就供给而言，家庭物质福利主要取决于其货币收入，劳动者对工作的选择不能不受相对工资的强烈影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信号和刺激”发生较大影响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但即使在这方面，非价格因素也发挥着几乎同等强烈的影响。例如，在个人职业选择上，工作地点，劳动环境，交通、托幼和住房条件，职业声望，人事关系，个人爱好等等，都有重大影响；此外，无论何处，几乎总有某种程度的行政分配在发挥作用。

工资紧张与工资膨胀

任何制度下的工人都愿意多拿工资，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工资“不

满”。除了这种意义的“不满”，还有两种特殊的“不满”。一种是通货膨胀引起人们对现行工资水平不满；另一种是某些社会集团同其它社会集团相比，对自己的工资水平不满。匈牙利人用“工资紧张”来表示这种不满。这两种不满都会产生提高工资的压力。

在古典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所有者与工会领导人为降低或提高工资而争斗。从总经理到工头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强烈抵制工会增加工资的努力。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企业和中低级管理部门的领导人是作为“工会主席”而不是“雇主”行事的。他们都尽力为本单位争取更高的工资。管理者行为不是他个人品质好坏决定的，而是他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这些企业和部门领导人不是对整个经济负责，而是对其中某一部分负责。如果他们能为本单位争取较高的工资，他们的下属就会把他们看作自己利益的代表，他们的工作就能做好。况且工资的提高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出去，因此，他们愿意提高工资。通常作为提高工资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本单位出现了工资紧张，即同其它单位比本单位工资太低。他们选作参照系的总是相对工资较高的单位。这种相互攀比是永无止境的。

总之，我们这里观察到的是对总需求的两个主要分量即投资和消费，几乎不可满足的饥渴。就消费而言，这种饥渴不仅通过“雇员”，而且通过“雇主”即企业领导人表现出来。显然，把经济作为整体，这两种饥渴是彼此矛盾的：用于投资的越多，用于消费的就越少。但这种矛盾只有最高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才内在地体验到，因为在决定中央计划的宏观经济指标时，不可能回避这个矛盾。而对最高级以下的每个负责人来说，这个矛盾则是外在的。他认为自己既应得到更多的投资，又应得到更多的消费，只要其它单位两项都少些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高决策者受他们自身所处的地位的驱使，起来抵制消费饥渴，正象他们起来抵制投资饥渴一样。而其他人员则只有受指示和禁令所迫，或者在经济和精神刺激下，才可能进行抵制。

工资膨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内在的通货膨胀因素。由于中低级管理人员不是抵制，而是支持它，就使它特别强有力。因此物价稳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1）中央制定的工资政策对工资膨胀的抵制是

否足够有力；（2）能否保证这个政策在实际上得到贯彻。

维持工资纪律的指示以及有关刺激制度可以使中低级管理人员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内在化。但其原因是行政的，而不是经济的。

第十七章 产品和服务在家庭之间的分配

本章讨论在家庭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方式。

充分满足和按劳分配

假如其它条件不变，任何个别需求在短期内有被充分满足的可能。这是因为：（1）人们在生理上对某些物品的需求是有限的；

（2）人们能用于消费的时间是有限的；（3）消费某些物品会伴随一些麻烦；（4）互补品的缺乏会抑制对某些物品的需要。这四者结合在一起，总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决定充分满足水平。

虽然每种需要在一定的时期都有自己的充分满足水平，但需要总体却不可能达到充分满足。因为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增加，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总会使需求增加。需求和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互补品的不断增加会使充分满足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总体总大于消费资料总体。

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上把“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这就允许一种完全取消货币的分配制度。事实上，社会也许能够充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必须以另一部分人较低的满足水平为代价，或者，社会能充分满足所有人的某些需要，但必须使他们的另一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较低。一个使一切公民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的社会，不仅今天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此，社会总面临着按什么方式把有限的消费品分配给它的成员，优先满足他们的哪些需要的问题。

分配方式

在当代一切社会制度中，有三种基本的分配方式及其组合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大部分消费品是借助它们分配给家庭的。

第一种分配方式叫拍卖（auction）。这种分配方式的唯一选择标准是需求价格。谁出价高，谁就得到消费品。因为出价高低同家庭财富和收入密切相关，所以一些人反对这种方式，认为它在道义和政治上不能接受。

第二种分配方式是配给 (rationing)。这种方式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生产者配给和行政配给。配给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按非价格标准分配。实际中常用的典型标准有：(a) 紧急需要；(b) 功绩；(c) 家庭背景；(d) 社会地位；(e) 政治表现；(f) 个人与分配者的亲属关系或友情；(g) 对分配者施惠的回报；(h) 贿赂。

很少有人否认标准 (a) 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它特别在这两方面作为选择标准出现：(1) 必须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按需分配”原则至少必须应用于基本需要。(2) 根据社会正义原则，必须使家庭中无收入的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配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在一些国家里，正是紧急需要这一标准促使决策者采取配给制。这在卫生、教育和住房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是对分配消费品是否要考虑功绩、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表现的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多得多。如何运用这些标准是判别社会制度的重要指标。

至于使用标准 (f)、(g) 和 (h)，通常会受到道德规范的谴责和法律的禁止。然而没有一种制度能避免这些弊端。区别在于这些标准经常还是偶然被采用，以及是否在重大或关键决策中被采用。

第三种分配方式是排队。其特征是以到达供应点的次序作为唯一标准。在其它标准不发挥作用的地方，排队标准往往自发地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

在现实中这三种方式经常彼此结合，共同发生作用。有四个因素对不同分配方式所占的比重发生重要影响。

(1) 价格对买卖双方的影响越小，拍卖方式的作用就越小，其它方式补充或取代它的程度就越大；

(2) 正常短缺强度越大，行政配给、供给者配给或买者排队的分配作用就越大；

(3) 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垄断程度越高，它应用非价格标准分配产品的程度就越高；

(4) 国家的经济作用越大，它对家庭收入实行再分配的程度越

高，行政配给方式及其组合方式的作用就越大。

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历史的趋势明确指向某种分配方式或分配方式的组合。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市场分配是历史的定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却认为，市场作用的扩大只是暂时的倒退，迟早要被行政配给所否定。

我们不想推断未来，那属于预言王国，而不属于科学王国。我们只限于指出过去几十年里观察到的趋势。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非市场分配方式的作用增强了；但就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市场方式的作用却不断增强。

关于比较分配方式的方法

我不想卷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分配方式发展方向的讨论。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许多参加讨论的人都犯了把一种分配方式的实际经验同另一种分配方式的理想状态相比较的逻辑错误。市场方式的拥护者正确地指出了排队所造成的负担和配给方式所带来的困难，如，选择标准任意武断，掌管配额的官员业务能力低下，道德品质令人怀疑，分配过程拖沓、僵死，等等；然后他们就把这样的配给制同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和始终不断地进行着瞬时调节的纯粹瓦尔拉斯市场加以比较。与此相反，反对市场方式的人正确地指出，市场的运转伴随着摩擦，造成浪费，市场对信号的反应经常发生滞后，市场分配方式偏袒富人，导致社会非正义，等等；然后他们就拿一种理想的配给方式来同市场方式比较。在这种理想的方式中，一些头脑灵敏、能力过人、道德品质无可指责的人，完全根据社会公认的标准来执行配给。

这种讨论不会有任何成果。富有成效的讨论应当是把一种分配方式的实际经验同另一种方式的实际经验加以对比，从而对各种分配方式在一定制度的组织结构内，在活生生的人手中如何起作用，或可能如何起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

第十八章 家庭：消费者行为

本章讨论家庭行为以及支配家庭消费和储蓄的规律。

强制支出、未支出货币和储蓄

家庭取得消费品是一个包含多步骤的决策过程。第一步是决定等待国家配给，还是自己购买。如果消费者决定自己购买，他就开始了采购消费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历搜寻、等待、排队和强制替代。这些已在研究企业采购时做过说明。现在的问题是当消费者买不到所需产品时，他手中的货币会怎样。存在两种可能：强制支出或未支出。

强制支出不同于强制替代，它是指购买与初始需求的产品属性完全不同的产品，而不是购买替代品。强制支出有三个原因：（1）消费者急躁，总想买点什么；（2）消费“动机”，在短缺条件下不能需要了再买，而是先买了备用；（3）通货膨胀预期。

有四种解释可以说明未支出货币：（1）购买过程中的摩擦，即买者不能迅速适应供给现状；（2）短缺严重，很难买点什么；（3）短缺非常普遍和严重，以致货币无法支出；（4）消费者储蓄愿望强烈。

我们把储蓄定义为一般时期中货币存量的增加额。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家庭储蓄的动机是：

（1）交易动机。它在任何经济中都起作用，但在短缺经济中由于搜寻、等待使交易过程拉长，因而同等交易所需货币可能较多。

（2）自愿事先储蓄，即为购买贵重物品预先存款。

（3）命令式事先储蓄。有一些分配方式组合要求购买者事先储蓄部分或全部购货款，然后才能提出购买申请。

（4）持币待购。这种动机的储蓄是短缺造成的。

（5）谨慎动机。如，为防老或防止意外而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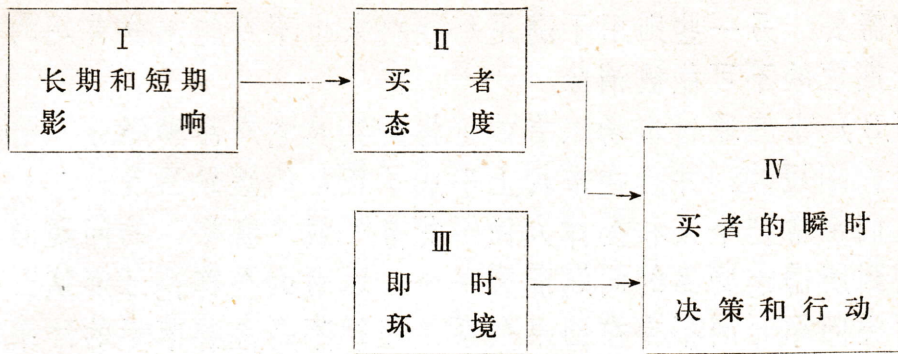
（6）投机动机。作为收入来源，利息所占比重极小，不足以诱使人们储蓄，同时又缺少投资机会，因而这种动机影响不大。

买者态度

我们用下式说明决定家庭购买行为的因果关系（图式见下页）：

即时环境（Ⅲ）包括：通行的价格；买者对不久前和即刻供给的直接经验和有关信息；排队长度和预期排队时间，等等。

买者态度包括：买者的行为方式、正常标准和容忍限度；决策和行动的惯例和经验方法；以及表明其行为特征参数，等等。买者态度的主要成分有：（1）使用不同分配方式的倾向；（2）自愿替代



倾向和初始需求函数；（3）强制替代倾向和修正过的需求函数；（4）搜寻倾向；（5）等待倾向；（6）排队倾向；（7）强制支出倾向；（8）储蓄倾向；（9）描述他争取卖者的努力的参数。

家庭成员的买者态度是在许多在长期和短期中发挥作用的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这里提出以下几个：

（1）家庭的社会地位，其所属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包括其成员通常的货币收入、职业、教育水平、性别、年龄、居住地点，等等。

（2）消费品供给的通常构成。只是就瞬时调节，才可把供求看做彼此独立的。就长期而言，需求基本上是供给的函数，生产者可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了人们的需求。

（3）市场的正常状态。我们论述的是吸纳经济，强制替代已成为习惯。

（4）消费品正常的相对价格。社会主义国家某些物品和服务由于补贴或免税，固定于低价；另一些则由于高税而维持高价。长期相对价格对消费习惯有重大影响，即使相对价格暂时脱离长期比例，消费习惯也不容易改变。

买者态度和即时环境共同决定了买者的瞬时决策和行动。

消费品部门的一般状况

我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消费品部门一般状况的几点假说。

（1）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消费水平有显著增长；同时，消费品部门的许多领域长期存在短缺。

（2）家庭通过行政配给，免费或以名义价格得到了某些产品和服务。其中一些产品和服务是用于满足那些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充分

满足的需要；另一些则用于满足那些将来也不可能充分满足的需要。这里长期短缺不可能被消除。

(3) 家庭通过市场以有效价格购买其它产品和服务。这些物品也存在长期短缺，并且在市场上形成了正常的短缺强度。

人们常常把个人和全体人民“贫穷”或“富裕”的问题同消费者能否买到所需消费品的问题混为一谈。本书的全部论证都试图表明，在这两类问题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短缺不是经济落后的结果，而是一定的制度原因造成的。人均产出和消费较低的国家也可以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就后果而言，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替代。生活在买方市场的穷人不会因想到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而感到安慰。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也不会因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忘记购买消费品的艰难。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对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应当更广义的理解。只观察实际消费是不够的，家庭如何取得它想要的消费品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短缺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有害影响。它剥夺了人们的大量自由时间，导致神经过敏和紧张。人们不仅因购物困难引起烦恼，而且经常要忍受卖者的粗暴和无礼。这个问题光靠教育卖者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短缺的客观事实持续不断地维持着卖者支配买者的关系。

第十九章 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部门的短缺

价格的形成和刚性

社会主义国家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匈牙利现行消费品价格的主要比例是在1946年稳定物价和1951年价格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当时订价有两个主要原则：(1) 相对价格反映相对成本。因为当时通货膨胀严重，不得不以1938年的成本和价格为依据。(2) 为了满足有关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社会偏好，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可以订得较低。后来相对成本和社会偏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价格刚性却阻止了消费品价格同新的条件相适应。

消费品的价格刚性是一定的制度条件和利益关系造成的。

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一般消费物价水平的提高相当于人们收入的普遍降低，这势必引起人们的不满。即使是消费品相对比价的变

动，也会伴有实质上的收入再分配。受益的人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或只是暗暗高兴；受损的人则会怨声载道。这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国家保证消费物价的稳定。

国家一旦承担起管理价格的责任，就陷入了“价格稳定性陷阱”。为了价格稳定，它不愿意持续不断地调整价格，它用补贴和利税的变动来抵销相对成本变动的影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消费品比价越来越不合理。一种体制越是能保持价格稳定，就越多地宣传这一点，人们就越希望价格稳定。一旦价格大规模调整，人们的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这就使价格调整越加困难。

消费品价格与短缺

提高消费品价格能使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减少。对那些只能用于家庭消费的产品来说，家庭部门需求的减少会使它们的短缺强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买者采购过程中出现的搜寻、等待、排队和强制替代会大大减少。开始提价时买者消费的商品量虽然会减少，但一段时间之后，卖者由于竞争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就可能使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从而使买者消费量提高。

但是，事实上相当多的产品和服务既适合家庭消费，也适合于企业或非营利机构部门使用。提价只能抑制家庭需求，而不能抑制这些部门的需求，它们可以不顾价格的提高，把家庭部门释放出的消费品吸入自己的部门并转为生产投入。因此，消费品提价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消费品短缺程度的降低。

消费品部门有自己正常的短缺强度，它是由非价格因素决定的。尽管短缺会加强物价上涨的趋势，但逆关系并不存在，即通货膨胀并不能使正常的短缺强度降低。

第二十章 货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本章将集中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的作用问题。

积极的货币与消极的货币

如果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取决于他们支配的货币数量，我们就说货币是积极的；反之，则说货币是消极的。

预算约束硬度和货币的积极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不是两种独立的现象，而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表述。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货币供给去适应货币需求，货币就是消极的；反之，预算约束是硬的，货币需求去适应货币供给，货币就是积极的。家庭部门有硬预算约束，因此货币积极发挥作用；企业部门是软预算约束，货币只是消极地起作用。

企业的短期资金来源

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都要用信贷来支付部分日常开支。对实际经验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命题：给企业提供短期信贷的制度是软的。信贷供给总是被动地适应企业的信贷需求。如果说，企业对信贷需求有某种“自我约束”，那么这只能用取得信贷需要申请来解释，而不应用需要支付利息来解释。利息负担并不会使企业自愿抑制对信贷的需求，因为它能把这个负担转嫁出去。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中，企业手中的货币不是有效约束，它购买从既定的物质供给中所能得到的一切，而不是它的货币所能买到的一切。这正是该体制中，资源利用达到瓶颈的原因。

投资资金来源

投资分配者给企业分配货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揭开货币的面纱，我们会发现实际的数量控制过程。看起来分配者在分配投资资金，实际上他同意进行的是实际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一旦开始，有关货币支出可能会远远超过原先的成本预算。初步的成本预算为投资执行者确定大致的方向，并对他们发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形成有效的硬约束。货币在这里只起消极作用。

储蓄和投资

投资在不同部门、行业和企业间的分配与它们各自的货币积累之间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就宏观层次而言，前一时期的储蓄与后一时期的投资意图之间也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投资意图及其实现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它们与过去积累起来的储蓄无关。如果投资活动增加而没有足够的货币资金，财政制度会创造出必须追加的货币。如果投资活动减慢，则货币存量增加。货币量的变动只是被动地反映投资意图及其实现发生的波动，并不是造成这些波动的原因。

在需求约束型体制中总存在可动用滞存，这为经济扩展提供了物

质可能。只要愿意投资，投资品供应是不成问题的。这正是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只取决于投资意图的原因。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投资意图大大超过现实可得到的投资品，因此，限制经济增长的是可用于投资的物质资源。

国家预算的平衡与赤字

在资源约束型体制下，国家预算平衡或赤字与经济中普遍的短缺强度高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预算平衡，但短缺严重；改革后财政有赤字，但短缺有所减缓。我们不是要表明国家预算与短缺之间存在负相关，而是要表明，社会生产能力的紧利用和短缺强度都不取决于国家收支的瞬时比例。长期短缺强度取决于实际投入品的预想使用量和实际可获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里谈的是一个半货币化的经济，其中包含一个有硬预算约束的、货币化的子系统和一个有软预算约束的、虚假货币化的子系统。它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那么，在这种经济中，国家预算是“软”还是“硬”？我们认为，它不能完全归入这两个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国家预算批准，在政府日常开支等方面，预算约束是硬的。但是，在投资支出和各种补贴方面，预算约束则相当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往往使国家预算约束变软。同时，遵守还是超出预算完全取决于中央经济领导人的“自我约束”。如果出现了赤字或实际赤字大于计划赤字，中央银行会提供资金来弥补赤字。因为银行本身就是受负责国家预算的同一批人管辖的。

第二十一章 宏观相互关系：吸纳模型

文章是一个局部总结，主要是通过一个水利学类比模型概括和强调前面论述过的某些命题，说明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吸纳与短缺，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吸纳经济的特征

短缺经济又可以叫做吸纳经济，因为这种经济中普遍长期存在的短缺正是其内部存在的吸纳机制造成的。

我们把社会产品比做水，它们分别储存在生产资料蓄水池和消费

资料蓄水池中。从企业到中央各级管理人员都有自己的水泵，并力图从公共蓄水池中吸取，这必然导致资源和产品的紧缺。吸纳的基本驱动力是各级管理人员的扩张冲动和与此相联系的投资饥渴，数量冲动和与此相关的囤积倾向，以及由这两种动力派生的出口冲动；此外还有家庭对免费消费品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等等。

吸纳作用表现在：（1）各企业之间争夺当前生产投入品和投资品，造成生产资料供应紧张；（2）企业部门把家庭部门的一部分消费品吸入本部门，并转化为生产投入；（3）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不受需求制约，而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受到家庭有效需求的制约，因此前者能把后者的生产投入吸走。

在吸纳经济中，控制有效需求的古典方法不能保证消费品滞存增加和短缺强度降低，因为不存在使消费品供给完全满足初始需求的规律：一方面，消费品一开始就是依据正常滞存水平和短缺强度被投放到国内市场的；另一方面，货币化的家庭部门和表面货币化的企业部门并没有完全隔离，这样企业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产生的持久吸纳，不仅引起生产资料短缺，而且通过吸走部分资源和产品，引起消费资料的短缺。

短缺的主要表现形式

本书指出了短缺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

（1）纵向短缺。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行政配给方式来分配，要求者提出的数量超过可供分配的数量。这是分配者与要求者纵向关系中出现的短缺。

（2）横向短缺。资源、产品和服务通过买卖的方式分配，卖者的供给不能满足买者的初始需求。这是卖者与买者横向关系中的短缺，即“卖方市场”。

（3）内部短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这是微观经济组织内部的短缺，即碰到资源约束。

（4）生产能力短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社会生产能力利用率接近于1，社会边际成本已经急剧上升。这是社会生产能力的短缺，或者说，整个社会生产碰到了资源约束。

这四种现象是短缺的直接表现，此外还有许多间接表现，它们经常重叠和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现象都包含在“短缺”这个集合概念

中。

我们说“普遍和长期短缺”并不意味着时时处处什么东西都短缺。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在亚微观层次上，短缺与滞存不仅相容，而且相伴而生。然而，由于两点理由，我们可以说“普遍和长期短缺”：首先，在许多地方，许多资源和产品存在频繁的相当严重的短缺，没有一个部门可以避免这种现象，今天短缺在这里减缓了，明天在那里又出现了；其次，无论何时何地出现短缺现象，它们总是由同一初始原因引起的，它们只是同一普遍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

经济政策、制度条件与短缺

自从我从事经济研究以来，下列三组现象的相互关系总是引起我的兴趣：（a）长期短缺；（b）追求高增长率的经济政策；（c）一定的制度条件，即高度集中，多级控制，行政配给，以及货币和价格的从属作用。

在我较早的两部著作，即《反均衡论》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中，我把（a）和（b）的关系看做主要的。而现在我认为，长期短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条件以及它们所决定的行为规律性。与此相比，经济领导者追求高增长的政策是次要因素，其作用在于加强或削弱主要因素的影响。

短缺与通货膨胀

长期短缺与稳定或几乎稳定的价格水平相容，同时也与通货膨胀和上升的价格水平相容。短缺可以同抑制型通货膨胀相联系，但并不必然如此，不应当把“抑制型通货膨胀”同“长期短缺经济”混为一谈。二者的区别在于：

（1）前者即使在“过热”状态中依然是一种货币化的经济；而后者只是半货币化经济。

（2）在前一种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在后一种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3）在前一种经济中，即使价格是固定的，它的高低对企业也是至关重要；而在后一种经济中，无论价格固定还是可变，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都比较小。

（4）在抑制型通货膨胀状态下，无法支出的货币会在买者手中积累起来，因为他们尚未习惯于短缺；而在短缺经济中，短缺已成为

正常状态，买者行为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他们在确定初始需求时已考虑到供给不足，即使没有考虑，他们也会通过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来适应这种状态。

短缺经济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简单地把凯恩斯描述的以失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颠倒过来，用所谓“抑制型通货膨胀”来描述和说明短缺经济是不恰当的。

这里我们得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论点：我们不应从金融领域或特殊的价格信息方面，而应从更深的层次，即从制度关系和这种关系所造就的决策者的行为规律性方面来说明长期短缺、吸纳和资源约束型体制的运行。

第二十二章 父爱主义的程度

在本书终结之际，我们论述一下制度结构的一个方面，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会有助于理解本书的主题——短缺。

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地位

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父母同子女的关系。我们用“父爱主义”（Paternalism）一词来表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资助和保护关系，并类比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关系。

我们把父爱主义划分为五种程度，序号由高到低排列，表示随着子女的成长，他们对父母的依赖逐渐减小。

程度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新生儿不会说话，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母给予的衣食，而父母则考虑孩子的全部物质需要。

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父母仍以实物形式给予孩子所需物品。但现在孩子也可能提出各种要求，父母和子女之间会对这些要求“讨价还价”，最后达成某种“妥协”。

程度2：货币津贴。孩子已经长大，但还不能自立，比如他到外地去上大学。他的生活费用仍由父母负担，但现在是以货币津贴的形式来负担。他与父母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没有停止，只是由实物的多少，转到了货币的多少。

程度1：自立——有助。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他基本上靠自己的

收入为生。但如果遇到困难，父母仍会给予资助。

程度0：自立——无助。过去的孩子已长大成人，父母已去世。他不能再依靠别人的资助，而只能靠自己的收入为生，并自己想办法去对付各种困难。他已完全自立。

在传统体制下，程度3的父爱主义是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典型形态。国家对企业所需的当前生产投入和投资实行实物配给。但是配额并不完全是国家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国家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

体制改革以后，父爱主义程度降低了。程度1和程度2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在企业当前生产投入和自有资金投资方面，国家与企业之间通行的是程度1的父爱主义关系。企业原则上是依靠自己，但是如果遇到困难，国家会以各种财政手段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当企业用国家资金投资时，通行的则是程度2的父爱主义。国家同企业通过“讨价还价”，决定投资配额的数量。

父爱主义程度变动的倾向和反倾向

程度0的父爱主义是弗里德曼—哈耶克学派的理想。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也不完全符合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涉主义越来越强大。这不应简单归诸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而应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任凭企业放任自流做原子式的竞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当前，生产已经高度集中，国家日益成为强大的力量。期望一个依赖选民支持的政府会告诉公众：失业、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等，完全是经济内部的事务，政府对其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政府不能不对经济状况负责，它所能选择的只是不同的目标和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制度下况且如此，社会主义下就更是这样。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伴随着国家政权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活动可以被限制或扩展，但总是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多级控制机构发展起来，它按照自身的规律成长并日益强大。这个机构的成员把自己同职位视为一体，这会给他们以动力去积极塑造经济生活的模式。所有这些可以说明自上而下的父爱主义倾向。这些倾向由自下而上对父爱主义的要求得到补充。

低级经济管理人员对父爱主义抱有矛盾的心理：他们既需要它，

又反对它。需要它是因为它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保险。国家不仅保证企业的生存，而且保证它不依赖自己的财源得到发展。反对它是因为它意味着上级部门对企业的不断干涉，企业独立性的丧失。

存在着使父爱主义程度降低的相反倾向。这里只强调引起这种反倾向的三个主要因素。

(1) 低级管理人员对独立性的要求。他们不愿意事事处处向上级伸手，宁愿靠自己的资源。这种愿望是改革背后的推动力之一。

(2)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公众和高级领导对低级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经常表示不满。基于这种认识，公众舆论赞同进行分散化的改革。

(3) 第三个因素是组织因素。较高度度的父爱主义是同配给的分配方式相联系的。但是，随着生产和消费差别日益增大，实行实物配给将越来越困难，这也会导致国家对企业保护和控制程度的减低。

父爱主义和预算约束的软化

父爱主义的程度与预算约束软硬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程度0的父爱主义意味着无论企业遇到什么困难国家一概不管。如果企业倒闭了，那是它自己的事。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预算约束必然是硬的。

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关系特征的是程度3—1的父爱主义。虽然这几种程度的父爱主义对企业保护的形式和程度有不同，但都足以使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既然企业的生存可以自动得到保证，困难可以向国家转嫁，发展可以靠国家投资或优惠来实现，那么，预算约束就不可能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严格意义上的一组经济现象（软预算约束，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横向和纵向的吸取资源和产品）和一组制度现象（较高度度的父爱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基本上能够说明前者。

有意识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我们的最后几点意见不仅涉及最后一章，而且涉及全书的主题。

本书贯穿通篇的观点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条件产生一定的行为方式、经济规律性和正常标准。这些不可能被国家的决策所取消。政府决策和国家计划并不要求长期短缺、投资紧张和价格上涨，但只

要维持这些现象的条件存在，它们就不可能被消除。

我们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生产当事人都受到扩张冲动的推动，不需要鼓励任何人投资。这正是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希望得到扩张冲动的好处，而同时希望完全消除投资紧张是不可能的。此外，喜欢消除失业，同时又希望劳动市场保持均衡，以消除劳动短缺的有害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同一过程在引出受欢迎的结果的同时，也导致令人不安的后果，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计划者和实际经济管理者面对这个制度的规律和内在倾向，只能望洋兴叹。自觉行动的领域是广阔的。我们只提出以下几种可能性。

某些倾向可以被加强，某些倾向可以被削弱。例如，我们不能靠命令消除价格上涨，但可能对它进行抑制。数量冲动产生短缺，短缺加强数量冲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央计划者本身是提出尽可能紧的数量指令，还是对数量冲动发挥缓和作用，却至关重要。经济政策还可以影响到不同部门的短缺强度。

我们还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采取行动，即通过更好地组织生产和交换，更好地协调计划，更好地获取和提供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和经济调节中的摩擦。

最后我们指出最重要之点：产生短缺现象的那些制度条件、行为方式和规律性，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或不可改变的。1968年匈牙利改革本身就证明了这个命题，即：谨慎的人类活动能够改变它们。这种性质的更深刻的变化将来还会出现，从而使短缺现象得到缓和。